

南 華 大 學

教育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台灣地區婦女勞動參與歷程之變遷

研 究 生：李大正

指導教授：楊靜利 博士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月

南 華 大 學

碩 士 學 位 論 文

教育社會學研究所

台灣地區婦女勞動參與歷程之變遷

研究生：李大正

經考試合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_____

楊靜利

蘇力

陳貴政

指導教授：楊靜利

所 長：蘇峰山

口試日期：中華民國 九十二年 六月 二十六日

誌 謝

本論文得以及時完成，首先要感謝楊靜利教授的用心指導。陳寬政與齊力教授在論文審查時，提供了許多寶貴的意見，在此一併致謝。

此外，感謝王仕圖教授、吳慧敏教授的鼓勵以及禹亮、百秀、佩萱、麗鵲、瓊樺等同窗好友們在論文寫作期間的協助。

僅將此論文獻給我最親愛的父母、兩位姊姊與璟麗，感謝他們對我無盡的付出與照顧。

摘要

隨著社會發展與變遷，台灣地區婦女勞動參與率呈現上升趨勢，代表社會對於女性勞動力的接納與需求程度已越來越高。雖然婦女勞動參與率持續上升，但並不代表女性在家庭與工作間的衝突就會降低，如果婦女的就業型態與歷程沒有產生變化，代表婦女勞動參與其實沒有多大的變遷。有關影響婦女就業因素的討論，以往研究已有相當豐富且一致的結論，因此本文將著重於種種因素作用之後，婦女勞動參與歷程的變遷。

婦女勞動參與變遷的原因可從供給面與需求面來看，前者如婦女擁有人力資本與所處的家庭生命週期是影響其勞動供給的主要因素；後者如社會環境能否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以及大眾如何看待婦女就業行為。為了檢視供給面與需求面因素對婦女勞動參與的影響，我們以在學率、平均教育年數、有偶率代表人力資本與家庭生命週期因素，以人均實質所得以及兩性相對工資反映經濟發展與社會的性別角色期望，分析其對於近三十年來（1971-2001）婦女勞動參與率變遷的影響。迴歸分析的結果顯示女性人力資本的提升以及經濟成長有利於婦女勞動參與率上升，家庭照顧負擔則有負向作用；唯相對工資未產生顯著影響效果，可能代表其反映了兩性相對人力資本的變化，而無法反映性別刻板印象之變化。

在婦女勞動參與歷程的變遷方面，我們首先利用 1965-2001 年「人力資源調查」的年齡別婦女勞動參與率資料，將之轉換為世代別婦女勞動參與率，以描繪出不同出生世代婦女的綜合勞動參與歷程。其次利用 1980 年、1990 年與 2000 年的「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資料，進一步分析婦女勞動參與類型與歷程的變遷。

結果顯示婦女勞動參與類型並沒有太大變化，近二十年來傳統型與中斷型兩者合計約佔了一半左右的比例，持續型則有下降趨勢。最明顯的變化是從未工作者的比例大幅下降。此隱含著家庭仍然是已婚婦女生活的重心；就業在組織家庭前是必要的，一旦成家之後，工作即可以犧牲，至少是短暫的犧牲。就

勞動參與歷程的變遷來看，主要的變化在於中斷型就業者離開勞動市場的年齡延後而重返勞動市場的時間提前，顯示婦女中斷就業的期間逐漸縮短。

關鍵詞：婦女勞動參與率、時期、世代

Female Labor Participation and its Historical Changes in Taiwan

Abstract

Although the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FLFP) rate in Taiwan has been increasing for decades, it does not mean that the conflict between family and work felt by women has diminished. For women, especially those married, the pattern of employment is as important as the level of FLFP rate in measuring their accessibility on work. In this thesis, a time series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employing macro variables is used to explain age-specific FLFP rate trends for 31 years, from 1971-2001. A family life course based strategy is used to evaluate employment pattern of women aged 40-49 in 1980, 1990, and 2000.

FLFP is determined by supply side and demand side factors. The former includes human capital and family constraint. The later include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ender role attitudes. For the operational manipulation in the regression model, we used enrollment and years of schooling, proportion of married women, consumer consumption index adjusted GDP per capita, and relative wage to men as indices of human capital, family constrain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ttitude shift on gender role, respectively. We find that the schooling rates and female marriage rates have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RGDP have positive effects. However, the effects of relative wage, which reflect the change of gender role attitudes, are not significant in most equations.

In order to describe the female employment changes, we used a 1965-2001 Manpower Survey to construct the synthetic employment process for different birth cohorts. By comparing data from the 1980 to 2000 Women's Marriage, Fertility and Employment Survey, we found out that conventional and interrupted employment

pattern is the most popular type (about 50%). The most apparent change is the proportion of never-worked type that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s to the interrupted type, the interrupted duration was shorter for the younger cohort.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at from early times to the present, half of the married women sacrificed work for family.

Results show that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and type do not vary greatly. In the past twenty years, conventional and interrupted employment pattern both account for around 50% while continuous type decreased. This means that the family is still very important to a married woman's life. Seeking employment before getting married is a must and once a family is formed, work can be given up or at least, for a time. From th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and historical changes, the biggest change is in the interrupted employment pattern workers who have left the labor force market at a much later age while returning to the labor market earlier. Female interrupted employment time is thus gradually shortening.

章節目錄

中文摘要	i
英文摘要	iii
章節目錄	v
圖目錄	vi
表目錄	vii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3
第二章 婦女勞動參與變遷的原因	5
第一節 新古典經濟學理論	5
第二節 供給面因素：人力資本與家庭生命週期	6
第三節 需求面因素：經濟發展與性別角色	8
第四節 實證研究回顧	9
第三章 光復後的社會變遷與婦女勞動參與	13
第一節 光復後的社會變遷	13
第二節 社會變遷與婦女勞動參與	19
第三節 小結	24
第四章 八零年代以來的婦女勞動參與歷程	26
第一節 婦女勞動參與歷程：時期別與世代別	26
第二節 婦女勞動參與類型及其變遷	31
第三節 婦女勞動參與歷程的變遷	37
第四節 小結	45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46
第一節 結論	46
第二節 討論與建議	48
附錄	50
參考文獻	51

圖目錄

圖 3-1	高級中等教育及高等教育學齡人口淨在學率變遷圖	14
圖 3-2	歷年台灣地區育齡婦女總生育率	15
圖 3-3	歷年子女年齡別有偶婦女勞動參與率	16
圖 3-4	歷年兩性受雇者平均薪資之比值	19
圖 4-1	歷年時期年齡別婦女勞動參與率	28
圖 4-2	歷年出生世代年齡別婦女勞動參與率	28
圖 4-3	出生世代年齡別婦女勞動參與率（虛擬）	30
圖 4-4	時期年齡別婦女勞動參與率（虛擬）	30
圖 4-5	「因結婚離職後未復職」者勞動參與歷程之變遷	39
圖 4-6	「因生育離職後未復職」者勞動參與歷程之變遷	39
圖 4-7	「因結婚離職後復職」者勞動參與歷程之變遷	40
圖 4-8	「因生育離職後復職」者勞動參與歷程之變遷	40
圖 4-9	「婚前持續工作」者勞動參與歷程之變遷	41
圖 4-10	「婚前無工作，婚後持續工作」者勞動參與歷程之變遷	41
圖 4-11	「結婚離職後曾復職，再離職」者勞動參與歷程之變遷	41
圖 4-12	「生育離職後曾復職，再離職」者勞動參與歷程之變遷	42
圖 4-13	各類型勞動參與歷程比較（1980 年）	43
圖 4-14	各類型勞動參與歷程比較（1990 年）	43
圖 4-15	各類型勞動參與歷程比較（2000 年）	44

表目錄

表 3-1	台灣地區歷年女性就業者之教育程度	14
表 3-2	台灣地區產業結構的變遷	17
表 3-3	歷年各行業兩性就業者比例	17
表 3-4	變項與資料來源說明	22
表 3-5	各年齡組迴歸式納入之自變項	22
表 3-6	各年齡組之迴歸參數估計值	24
表 4-1	婦女勞動參與類型分類	31
表 4-2	婦女勞動參與類型定義	33
表 4-3	1980 年、1990 年、與 2000 年 個人特質與就業狀況	35
表 4-4	婦女勞動參與類型變遷：1980 年、1990 年、與 2000 年	37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戰後五十多年以來，台灣的經濟與社會經歷了巨大的轉變，從以農業經濟為主的社會轉變為新興工業化社會，同時經歷了人口轉型、教育水準提升、家庭結構變遷等各方面變化。工業化所帶來的複雜分工以及職業結構的轉變，使得勞動力需求日增且多元，加上女性教育水準提升、生育率下降等因素，提升了女性參與勞動市場的機會。根據行政院主計處 2001 年「人力資源調查報告」資料顯示：台灣地區婦女勞動參與率從 1978 年的 39.1%，上升到 2001 年的 46.1%，女性勞動力佔總勞動力人數達 40.5%。只是與部分已開發國家相較，仍有成長的空間¹。

無論從年齡別、婚姻別或教育程度別來看，婦女的勞動行為都呈現出相當的變化，尤以有偶婦女為然。婦女是否參與勞動以及參與勞動的型態（如全時工作或部分時間工作）與過程（如退出後再進入），與其本身所處的生命週期階段有相當密切的關係，因此有關婦女的勞動參與情形，經常是就生命週期（life cycle，有些使用 life course 一詞，中文譯為生活歷程）的角度，尤其是結婚與生育之歷程來討論（孫智嫻與李朝賢，1992；Waite，1980；Drobnic, Blossfeld and Rohwer，1999；Yi and Chien，2002）。

過去有關婦女勞動參與的研究，最主要的重點在於影響婦女是否參與勞動的因素（張素梅，1988；蔡青龍，1988；張晉芬，1996；呂玉瑕，1997；簡文吟，1997；Wait，1980；Ferber，1982；Desai and Waite，1991；Barrow，1999）。其次是對於婦女勞參類型的討論，例如有些婦女於婚育後中斷就業，中斷後，有的會再投入，有的不會；部分婦女能持續就業，部分則從未就業。種種不同

¹ 2001 年各國婦女勞參率：新加坡：54.3%，香港：50.7%，日本：49.2%，美國：60.1%（行政院勞委會《國際勞動統計》，2002）。

勞動參與類型的婦女，有哪些相異之處，是此類研究關心的焦點（簡文吟與薛承泰，1996；伊慶春與簡文吟，2001；Lu，1992、1995；Sorensen，1983；Drobnic，Blossfeld and Rohwer，1999）。再者，就曾經因婚育中斷就業的婦女，離職後是否會重回勞動市場，重返的時機與影響因素為何，也是相關討論關心的重點（簡文吟，1997；薛承泰，2000）。

婦女勞動參與為一動態的歷程，然而過去的研究大多限於單一時點的分析，較缺乏對婦女勞動參與歷程及其變遷情形的了解。主要原因在於資料與時間上的限制，因為若欲呈現婦女一生勞動參與歷程的變化，必須長期觀察一個或一群女性一生的勞動參與情形，記錄其勞動參與歷史，資料蒐集上相當費時耗力。加上國內目前並無此方面的長期追蹤訪視資料，因此有關婦女勞動參與歷程的討論也就較少。

有關婦女勞動參與歷程的動態變化可從兩方面來看，一方面是描述婦女本身一生進出勞動市場的歷程，另一方面是透過不同世代婦女勞動參與歷程的描述來觀察其變遷趨勢。隨著女性教育程度的提升、初婚年齡延後，生育率的下降等，不同世代女性勞動參與的程度以及進出勞動市場之時機可能不同；若因為生育而退出勞動市場，晚近世代女性生育數量減少，生育的影響時間縮短，再就業的時間可提前，或可不必以退出來動市場來因應。換句話說，不同出生世代女性有不同的人口特徵，在面對不同的時代背景及社會變遷下，不同世代女性的勞動參與類型與步調可能會產生變化。

台灣光復後短短四、五十年間經歷快速的社會發展與變遷。尤其在教育結構、人口結構與經濟結構的變化上甚為明顯。隨著這些結構變遷，婦女勞動參與率逐年上升，同時伴隨著勞動參與類型與歷程的變遷，只是其變遷的細節仍有待進一步釐清。因此，本文將透過不同世代女性的勞動參與類型與歷程的比較，來瞭解其變化趨勢。

第二節、研究範圍與方法

婦女一生的勞動參與歷程必須透過長期追蹤資料 (panel data) 才得以獲知全貌，但此類資料的蒐集甚為費時費力，且目前國內沒有婦女勞動參與長期追蹤資料，因此以往研究多使用橫斷面資料，討論處於不同家庭生命週期階段婦女的勞動參與情形，來組合婦女勞動參與的歷程。

除了使用不同時期的橫斷面資料外，透過回溯性 (retrospective) 調查資料紀錄婦女的勞動參與史，亦可為婦女勞參歷程研究的一個方法。Sorensen(1983) 將婦女勞參歷程與生命週期做結合，以不同生命週期階段婦女是否就業的情形來組合婦女勞動參與歷程，並將之區分為傳統型、中斷型、雙軌型、不穩定型四種勞動參與類型²。簡文吟與薛承泰(1996) 則以「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二期第二次的調查資料，配合家庭生命週期階段，依婦女在各階段是否就業區分連續就業、生育中斷、結婚中斷、從未就業四個勞動參與型態。此類研究指出了婦女勞動參與歷程的多變性，但主要焦點仍在討論不同生命週期階段婦女就業與否及其影響因素。以往研究對於影響婦女就業因素已有相當豐富且一致的結論，因此本文將著重於這些因素作用之後，婦女勞動參與歷程的變遷。

為了呈現社會變遷下婦女勞動參與歷程的變化，本文首先以婦女勞動參與率為指標，利用 1965-2001 年「人力資源調查」的年齡別婦女勞動參與率資料，將之轉換為世代別婦女勞動參與率，嘗試描繪出不同出生世代婦女的綜合勞動參與歷程。其次利用 1980 年、1990 年與 2000 年的「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資料，分析不同世代婦女勞動參與類型的變遷，並利用該調查所蒐集的相關個人資料，如學歷、初婚年齡、生育第一胎時的年齡、離職後復職的時間等回溯性資料，重組並比較三個世代婦女的勞動參與歷程。由於結婚與生育的年齡不斷延後，為了確保比較的三個時期之世代資料包含充分的家庭生活階段，我們擷取 40-49 歲的人口來進行比較。

² 此四種婦女勞動參與類型的定義請參考第四章表 4-1。

本文第一章為緒論，說明研究目的、範圍與方法。第二章討論婦女勞動參與變遷的原因，主要從不同理論觀點對婦女勞參行為的解釋出發，探討婦女勞動參與變遷的原因，並回顧相關實證研究。第三章討論光復後台灣教育、人口、經濟結構變遷與婦女勞動參與間的關連，並利用時期別與世代別婦女勞參率說明婦女勞動參與歷程的變遷情形。第四章說明台灣婦女勞動參與類型的變遷，同時描繪並比較不同世代婦女的勞動參與歷程。第五章為結論與建議。

第二章 婦女勞動參與變遷的原因

各國婦女勞動參與率在短短半世紀內產生明顯的改變，引起許多學者的研究興趣，相關的議題在社會學與經濟學界有相當廣泛的討論。無論是從數量上或就業型態的變化來看，婦女勞動參與都個人擁有的資源、整體社會經濟環境變遷、兩性觀念的改變等有關。本章首先從新古典經濟學觀點討論個人的勞動供給，其次說明影響婦女勞動參與的供給面與需求面因素，最後回顧相關實證研究。

第一節 新古典經濟學理論

勞動供給在新古典經濟學理論中是個人面對預算限制，進行消費和閒暇的選擇以最大化自身效用的結果。該理論以市場工資率的變化說明個人的勞動供給，工資率改變對勞動供給的作用可分為所得效果與替代效果，假設我們將閒暇視為一般消費品（normal goods），當工資率升高時，閒暇的價格（閒暇的機會成本）也上升，個人購買閒暇的能力減小，對閒暇的需求數量進一步減少，工作時間增加（勞動供給增加），此即所謂工資率改變對勞動供給的替代效果。另一方面，個人也可能隨著工資率的升高而提升對閒暇的需求，因此選擇更多的閒暇，而減少了工作時數（勞動供給減少），此即工資率改變對勞動供給的所得效果。簡而言之，若工資增加的所得效果大於替代效果，則個人會花較多時間在閒暇上，因而減少勞動時間，對勞動供給有負作用。反之，當工資增加的替代效果大於所得效果時，休閒時間的機會成本隨工資率增加而增加，個人會花較多時間在工作，增加勞動供給。市場工資率變化對勞動供給的影響視所得效果與替代效果的強弱而定（劉鶯釧，1994；Hamermesh and Rees，1993）。

然而，僅將個人時間區分為工作與休閒時間似乎無法完全解釋婦女（尤其是已婚婦女）的時間分配，因為婦女除了工作與休閒外，家務工作與子女照顧等亦占去生活中不少時間。此外，有偶婦女的勞動行為不只受到自身工資水準

的影響，也與丈夫的勞動供給與工資水平間有交互影響作用，因此部分學者將個人效用最大化的概念延伸到以家庭為分析單位，將個人勞動供給置入家庭的脈絡中分析（Killingsworth，1983；吳慧瑛，1996）。此類觀點可以 Becker 的芝加哥理論（亦稱為新家庭經濟學）為代表，強調家庭聯合生產、分工和消費的概念。Becker 指出對家庭成員來說，無論是市場工作還是家務勞動，進行某種程度的專業化都是有利的；經濟角色的專業化是夫妻聯合決策下的結果，假使妻子比丈夫在待在家從事家務更具比較利益（丈夫外出工作、妻子從事家務工作的邊際生產力較高），預期丈夫將投入較多的時間於勞動市場，妻子會傾向將較多時間分配於家庭（王文娟等譯，1997）。

上述的討論視休閒與勞動參與互為機會成本，或者將休閒視為勞動的延伸報酬，哪一種關係則依工資率的水準而定。而市場工資率如何決定？工資雖然有僵固性，但基本上仍明顯受到勞動供給量與需求量的影響：當供給量大於需求量，工資率下降，使得參與勞動的誘因降低；當供給量小於需求量，工資率上漲，誘發參與勞動；如果工資率高過一定水準，又反而促使減少勞動的時間。所以工資率影響勞動供給數量，但同時也受勞動供給數量的影響，而廠商的勞動需求自然也是另外一個影響因素。從供給面來看，婦女擁有的人力資本與所處家庭生命週期是影響其勞動供給的主要因素；從需求面來看，社會環境能否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以及如何看待婦女就業行為也會影響工資率的高低，以下分別討論這兩個因素。

第二節 供給面因素：人力資本與家庭生命週期

個人藉以獲得勞動報酬的專業知識與技能，如教育、技術訓練、在職訓練等，通稱人力資本，個人透過人力資本的投入以增加其能力並期望在未來獲得更好報酬（Becker，1980）。雖然廣泛的人力資本投入不僅止於個人所受的教育，但在實證研究分析中，教育程度是最常用來代表個人人力資本的指標之一。延伸人力資本論觀點於婦女的勞動行為的解釋上，通常將焦點置於個人教育程

度、工作經驗等對婦女進出勞動市場抉擇的影響。教育程度、職業地位、工作年資越高的女性，相對而言將獲得越高的薪資(張昌吉, 1992; Schumann, Ahlburg and Mahoney, 1994), 退出勞動市場的機會成本也就越高(Leibowitz, 1974)。故透過市場工資率的影響，人力資本的提高將間接增加婦女勞動參與的意願以及改變婦女對家務與工作時間分配的考量。此外，女性教育水平的提升可能改變其對工作的看法，或可擴張職業選擇的範圍而增加就業機會。

另一個影響婦女勞動參與的供給面因素是從婦女所處家庭生命週期的脈絡下來分析，強調婦女進入婚育階段後面對之家庭與工作衝突對其勞動參與時機與型態的影響。家庭生命週期的概念早期由鄉村社會學家(Sorokin, Zimmermann and Galpin, 1931; Loomis and Gamilton, 1936)提出，主要包括婚姻、養兒育女、子女離家至婚姻解組等重要事件；Glick(1947)則是最早界定家庭生命週期內容的學者¹，其後許多研究以此擴張與修正(引自楊靜利與劉一龍, 2002, p.80)。然而，傳統家庭生命週期概念所關注的只是典型的核家庭，未能充分掌握不同家庭結構所經歷的生命週期差異；再者，各生命週期階段發生的時機、階段間隔長短差異、事件發生順序等變異也是使用此概念時需加以留意的(簡文吟, 1997)。

婦女的勞動參與行為並非持續穩定的狀態，在不同的家庭生命週期階段，婦女會斟酌現時條件的狀況而選擇進出勞參市場。如家庭成員數及年齡的變化、家庭所得的增減，家庭成員需求的改變等皆可能是婦女是否參與勞動的考量。晚近研究逐漸將家庭生命週期納入討論婦女勞動參與時重要的參考便是鑑於家庭需求對婦女的重要性，而將家庭生命週期作為討論婦女勞動參與的框架，以結婚、生育、子女年齡等視為影響因素。尤其婚後至第一胎出生時可說是是婦女工作與家庭角色衝突最明顯的時期，因此此一階段婦女的勞動參與情形常成為討論的焦點(Waite, 1980; Sorensen, 1983; Drobnic, Blossfeld and Rohwer, 1999)。

¹ Glick(1947)以下列生命事件區分家庭生命週期各個階段：初婚、第一個子女出生、最後一個子女出生、第一個子女結婚、最後一個子女結婚、夫妻之一死亡、另一位夫/妻死亡。有關傳統家庭生命週期的發展以及台灣家庭生命週期的討論可參閱楊靜利與劉一龍(2002)。

第三節 需求面因素：經濟發展與性別角色

除了婦女個人與家庭等供給面因素對其勞動參與的影響外，需求面因素的討論在此以整體經濟發展與性別角色變遷來說明。此兩方面可視為社會對於婦女勞動的拉力與推力。

整體經濟發展對婦女勞動參與的影響可從產業結構的變遷來看，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整體婦女勞動參與會呈現先降後升的趨勢。在經濟發展初期以及工業化過程中，第二級產業增加，對勞動力的需求量也增加，但女性常在人力資本不足、持家觀念以及工作性別歧視下不易取得工作。到了經濟發展中後期，在經濟持續成長以及第三級產業增加的帶動下，工作機會增加，社會對女性勞動力的需求也增加，進而提升婦女勞動參與的機會（Pampel and Tanaka, 1986）。台灣經濟發展的歷程與上述的發展脈絡類似，台灣早期處於農業社會階段，當時的經濟活動多屬家戶生產型態，許多婦女在家中幫忙農務工作，但農業機械化後，減少了對女性人力的需求。1970、1980 年代後，隨著經濟發展，台灣從農業社會轉為工業社會，家庭生產的型態逐漸為工廠生產取代，此時勞力密集工業極需要勞工，提供了許多女性就業的機會。此外，女性勞動力也從農業部門逐漸移轉到工業部門。90 年代後，服務業部門快速成長，加上女性教育程度提昇及訓練機會增加，吸引了更多女性投入勞動市場。過去的研究也顯示，相對於男性，經濟成長對女性勞動供給的影響較大（李誠，1975）。

性別角色態度指個人對兩性合適行為的期待與認定。從社會化的角度來看，性別角色態度是社會化過程型塑而來的，包括個人社會化過程中（家庭背景、教育等）所習得的態度以及目前社會價值觀念的影響，此將進一步影響婦女勞動參與的意願與行為（Lu, 1993）。一般而言，性別角色越現代化者²，就業的傾向越高，而就業婦女的性別角色態度也可能因就業行為而更趨現代化（Ferber, 1982）。隨著時代的變遷與教育的普及，傳統社會形塑的男主外、女

² 所謂現代的性別角色態度指個人對兩性工作或地位，或家務分工抱持平等的觀念，而傳統的性別角色態度指男人負責在外謀生，女人負責家事及照顧孩子的傳統觀念（伊慶春與高淑貴，1986）。

主內性別角色期待與分工方式已有所修正；兩性平等觀念逐漸抬頭，家庭不再是婦女生活唯一的重心，性別角色刻板化印象的式微也減低了對婦女外出工作的阻力（Bielby and Bielby, 1984）。

Thornton, Alwin and Camburn (1983) 的研究指出，自 1970 年代起，美國社會對婦女角色觀念益趨平等，促進了婦女參與勞動市場。另外，母親的性別角色態度是影響下一代性別角色態度形成的重要因素。在年輕世代、有工作經驗、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身上更可看出現代化的傾向，尤其對婦女參與勞動市場的態度上（Scott, Alwin and Braun, 1996）。

對於職業婦女而言，生育後同時扮演好妻子、母親、工作者的角色確實不是易事，婦女對工作的態度可能會左右生育後的工作決定；抱持傳統態度者通常視自己對家庭與孩子的照顧責任重於工作，而較傾向於在生育後退出勞動市場（Glass and Riley, 1998）。

第四節 實證研究回顧

由以上幾個論點可瞭解婦女勞動參與的行為是受到個人、家庭以及社會經濟環境共同作用的結果。新古典經濟學與人力資本論對婦女勞動參與行為的解釋強調個人時間分配效用最大化以及機會成本最小化下的理性考量。家庭生命週期觀點則強調了解婦女勞動參與需考量其動態的過程。性別角色態度與經濟發展觀點著重社會與經濟結構的限制。

Smith and Ward (1985) 以美國的時間數列資料檢視工資率與婦女勞動參與率的關係，指出 1950 至 1970 年間婦女勞動參與率的提升大部分可由實際工資的上漲加以解釋，但 1970 年之後實際工資開始下降，婦女勞動參與率卻依然持續上升，可見仍有其他重要因素影響婦女勞動參與率的變化。Blau and Grossberg (1991) 的研究結果也支持工資率上升對婦女勞動參與率有促進的作用，但該文強調，主要是由於婦女對未來工作機會、工資變化以及另一半收入變化的不確定感，使得她們願意接受目前的工資水準而持續進入勞動市場。1980 年代以

後，美國婦女勞動參與率的上升主要是因為供給面的增加，大部分已婚婦女願意持續留在勞動市場，工資多寡的影響不大，對婦女勞動參與率增加的解釋僅約 15% (Lombard, 1999)。

婦女勞動參與除了數量上的變遷外，另一個為學者們關注的特徵在於勞動歷程的多變性。例如有些女性在婚育後退出勞動市場，之後便不再投入，有些則等待子女到了學齡之後再重回勞動市場，有些則能持續就業。中斷就業常造成婦女人力資本累積與薪資上的不利，因此哪些是影響婦女就業型態的因素，如何避免或減少中斷就業帶來的損失等，成為學者及政策制訂者關心的議題。事實上，婦女就業型態與婦女是否就業的討論類似，可視為婦女在不同生命週期階段以及不同個人及社會背景下，是否參與勞動市場及參與程度的結果，因此相關實證研究的討論也多從人力資本論、家庭生命週期、整體經濟發展、性別角色變遷等觀點切入。研究對象方面，晚近研究多在家庭生命週期的框架下討論婦女勞動參與影響因素，因此大多數研究均以已婚婦女為研究對象。

女性通常在婚後會面對家庭與工作的衝突，主要是因為長久以來家務負擔與子女照顧的重擔一直落在妻子身上，即使在雙薪家庭中，妻子仍是家務工作的主要擔負者 (Presser, 1994)。加上傳統相夫教子觀念的影響，使得部分女性在婚後選擇做全職家庭主婦。雖然婦女可以在退出後一段時間，度過家庭照顧需求高峰期後，重回勞動市場，但中斷就業已對於其職業生涯帶來負面影響，尤其常造成薪資及職業地位上的不利 (薛承泰、簡文吟, 1997; Felmler, 1995)。

從婚姻狀況來看，似乎隱含著從單身到有偶，提升了原本有工作的女性退出勞動市場的機率 (Felmler, 1984); Drobnic, Blossfeld and Rohwer (1999) 的研究指出，已婚女性退出勞動市場的機率是未婚女性的 2.15 倍。就影響因素而言，婦女在婚後進出勞動市場時機與抉擇與其本身教育程度、婚前職業、工作經驗、另一半的經濟狀況等有關。從人力資本論的觀點來看，人力資本較高女性，通常代表其薪資所得較高，退出勞動市場的機會成本也就相對提高；即使考慮婚後退出勞動市場，也會延遲退出的時間以減低退出的成本。研究指出，受教年數與工作經驗較長者，離職機會成本較高，越不容易在婚後離職

(Sorensen, 1983; 張晉芬, 1996)。此外, 人力資本越高者在生育後仍較偏向於持續參與勞動市場, 即使在生育後退出勞動市場, 重返的可能性越大, 時間也較早 (McLaughlin, 1982; 蔡青龍, 1988; 薛承泰, 2000)。不過 Hill and Stafford (1974) 的研究結果卻相反, 顯示教育程度越高者越可能於生育後退出勞動市場。他們對此結果的解釋是認為社經地位較高的父母, 較重視子女的教育品質, 願意在子女年幼時投入更多的時間在子女身上, 因此教育程度對有年幼子女的婦女就業而言有負向作用 (引自 Waite, 1980, p.280)。

對已婚婦女而言, 主要的家庭照顧負擔來自於幼年子女的照顧需求, 多數研究以生育率以及子女數量 (尤其是幼年子女數) 作為家庭照顧需求的指標。部分研究指出生育率越高, 婦女勞動參與率越低 (張素梅, 1988); 子女數目越多、年齡越小, 婦女需花費較多的時間於子女照顧上, 退出勞動市場的機率也越高 (Wait, 1980; Felmler, 1995; 張清溪, 1980; 簡文吟與薛承泰, 1996)。Leibowitz and Klerman (1995) 則發現長期來看, 子女數目對婦女勞動參與的影響隨著世代的推移有逐漸減小趨勢。此外, 生育與婦女勞動參與兩者似乎存在互相影響的關係; 楊靜利 (1996) 指出婦女勞動參與率的提高對生育率的下跌有顯著的影響, 尤其在生育率高峰點的年齡組上影響力更大。Cramer (1980) 則認為生育率對婦女勞參行為的影響是短期的, 而婦女就業對生育行為的影響則是長期的。從婦女的時間運用來看, 若年幼子女數目越多, 婦女參與勞動市場的時間越少。若因為子女照顧而中斷就業, 對於教育程度、職業地位越高的婦女而言, 由於其潛在薪資能力較高, 付出的成本就越高 (Charles, 2002)。

雖然家庭照顧責任對婦女就業是股阻力, 但是家庭中若有其他家人分擔婦女的家務與子女照顧時, 則有助於其投入勞動市場 (單驥與陳圳忠, 1990; 呂玉瑕, 1997)。相對於中斷的就業型態, 部分婦女能持續就業, 可能是因為她們在婚育後投身非正式工作 (以無酬家屬為主要內涵) 或兼職工作, 或由於婚後投入夫家的家庭企業, 才得以有不中斷的就業生涯。此種持續就業可說是家庭角色的延伸 (Lu, 1992; 伊慶春與簡文吟, 2001)。

除了婦女個人人力資本與婚育因素外, 家庭的經濟狀況以及丈夫對妻子就

業的態度也是已婚婦女勞動供給的影響因素。部分研究以丈夫的教育程度或收入作為衡量家庭經濟狀況的指標，結果指出丈夫收入或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利於妻子就業，即使中斷就業，退出的時間較晚，復職的機率也越高（McLaughlin, 1982；Dooley, 1994；Leibowitz and Klerman, 1995；簡文吟, 1997；薛承泰, 2000）。至於性別角色態度態度的影響方面，丈夫抱持開放的態度有利於妻子外出工作（Ferber, 1982）。總體經濟環境對婦女勞動的影響之實證研究的數量則比較少，晚近只有劉鶯釧（1994）使用 1964-1990 年台灣地區勞動力調查資料，以粗就業率代表婦女就業機會，以平均每人所得衡量經濟發展，來討論經濟環境對婦女勞動參與的關係，結果顯示此兩變項對各年齡組婦女勞動參與率皆有正向的作用力。

從以上的討論可瞭解婦女是否勞參勞動市場及其參與的類型受到個人人力資本、家庭狀況與總體社會經濟結構變遷的影響，單一論點或因素不足以完整解釋婦女勞動參與的變遷。台灣光復以來，兩性平均教育程度的差距已隨著教育普及與擴張而逐漸消弭，生育率下降預期將縮小子女照顧負擔對婦女勞動參與的影響，經濟發展擴張了對女性勞動力的需求。無論從總體或個體層面、供給或需求面來看，皆有利於婦女勞動供給在量上的增加。然而，數量上的增加僅是婦女勞動參與變遷的一部分，若能對其內涵的變化，如勞動參與的類型與歷程的變遷情形做進一步的探討，將有助於我們對婦女勞動參與狀況的掌握與瞭解。

第三章 光復後的社會變遷與婦女勞動參與

回顧先前有關婦女勞動參與之討論，如果重點在於婦女人力資本的提升以及家庭牽絆的變化時，經常使用個體資料來說明，而將總體環境的因素以年齡變項（區分世代）為替代指標，用以反映社會經濟變遷、社會價值觀的改變，或是勞動需求的變化等（如 Lu，1995；伊慶春與簡文吟，2001）。相反的，總體資料分析不強調個體間的差異，而著重於時間序列上的平均水準變化，較能掌握大環境變遷對於婦女勞動參與的影響。只是在集合總體資料的過程中，某些變項上的個體差異容易被弭平，因而產生區位謬誤。無論如何，個體資料與總體資料分析均有其必要。

本章首先說明光復以來台灣教育結構、人口結構、經濟結構以及性別薪資差異的變遷趨勢，其次選擇相關的指標變項，說明其對婦女勞動參與率的影響，最後為結論。

第一節 光復後的社會變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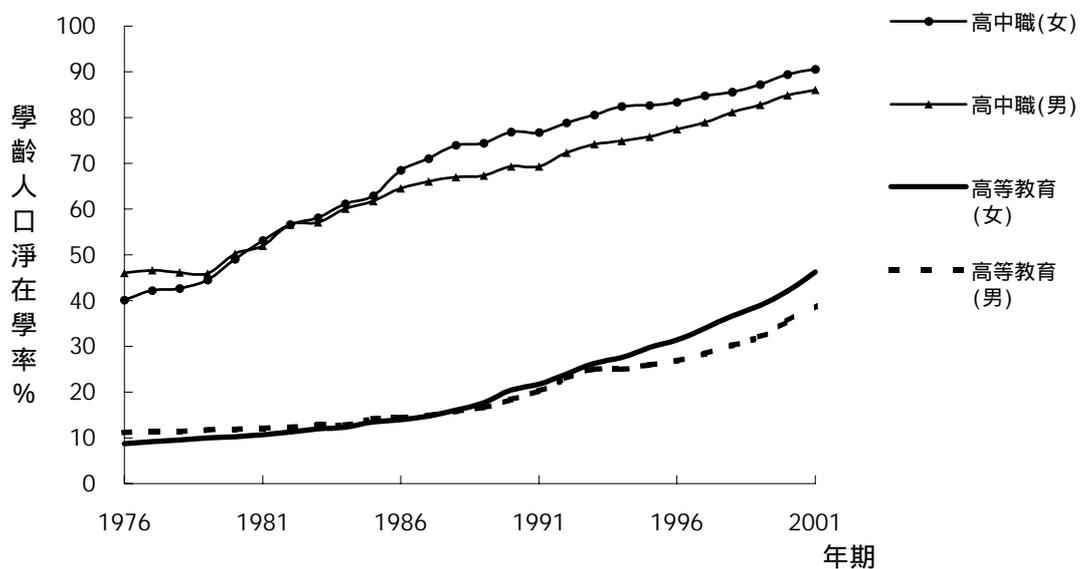
一、教育結構

台灣光復後，國民政府將初等教育列入國民教育系統，凡是 6 至 11 歲的學童均需接受六年免費義務教育，此國民教育政策的推行使國小學齡兒童達成充分就學。自 1968 年後，政府實施九年國民教育制度，將初中三年納入國民教育，大幅提昇了國中學齡人口在學率。近二十多年來高級中等教育在學率逐年提升，兩性的差異也早已相去不遠。高等教育的發展則可謂迅速，根據教育部高教司的統計，1949 年政府遷台之初，台灣只有一所大學，三所獨立學院，學生數總僅五千餘人。半世紀後，大學校院已達一百三十五所（含軍警校院及空中大學），學生數逾六十四萬。在兩性差異方面，近年來女性高教人口淨在學率已超過男性。從圖 3-1 可看出近二十多年來兩性高級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學齡人口

在學率已相當接近，顯示兩性教育水平已漸趨平等。

各級教育發展最直接的結果就是促使勞動力素質的提高。從表 3-1 可看出近二十年來女性勞動力素質顯著提升，在 1981 年時，僅有三分之一女性勞動力擁有高中職以上程度，到了 2001 年時，三分之二的女性勞動力為高中職以上教育程度，大專以上者更佔了將近三分之一。顯見教育普及與高等教育擴張提升了女性勞動力素質。

圖 3-1 高級中等教育及高等教育學齡人口淨在學率變遷圖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教育統計(2002)，教育部。

表 3-1 台灣地區歷年女性就業者之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					總計
	不識字及自修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大專及以上	
1981	307(13.7)	799(35.7)	404(18.1)	494(22.1)	232(10.4)	2236(100)
1991	221(7.0)	865(27.3)	514(16.3)	1052(33.2)	512(16.2)	3164(100)
2001	88(2.3)	596(15.6)	537(14.0)	1447(37.8)	1162(30.3)	3830(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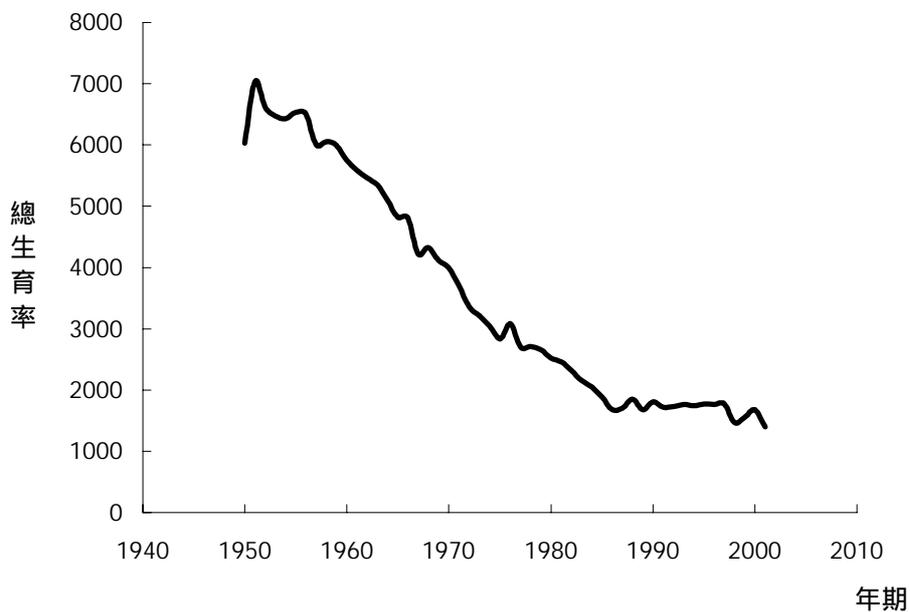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人力資源調查(2001)，行政院主計處。

說明：單位：千人，括弧內為百分比數。

二、人口結構

台灣人口變遷的主要成因來自於日據時代的死亡率下跌與光復後的出生率下跌，1920 年嬰幼兒死亡率的下落帶動了出生率的下降（陳寬政、王德睦與陳文玲，1986）。人口結構變遷過程中對婦女勞動參與影響最大者當屬生育率的變化，從生育率與婦女勞參率間的負向關係中¹，可預期婦女勞參率將隨著生育率下跌而將上升。圖 3-2 為歷年台灣地區育齡婦女總生育率的變化圖，所謂育齡婦女總生育率係指每千名婦女若每年按照目前育齡婦女年齡別生育率來生育的話，在 15 至 49 歲期間共可生育幾名子女。從圖 3-2 可看出育齡婦女總生育率自 1950 年代初期以後逐漸下降。隨著子女數量的減少，婦女照顧子女的時間也就相對縮短，將使得婦女有更多的時間得以參與勞動市場。

圖 3-2 歷年台灣地區育齡婦女總生育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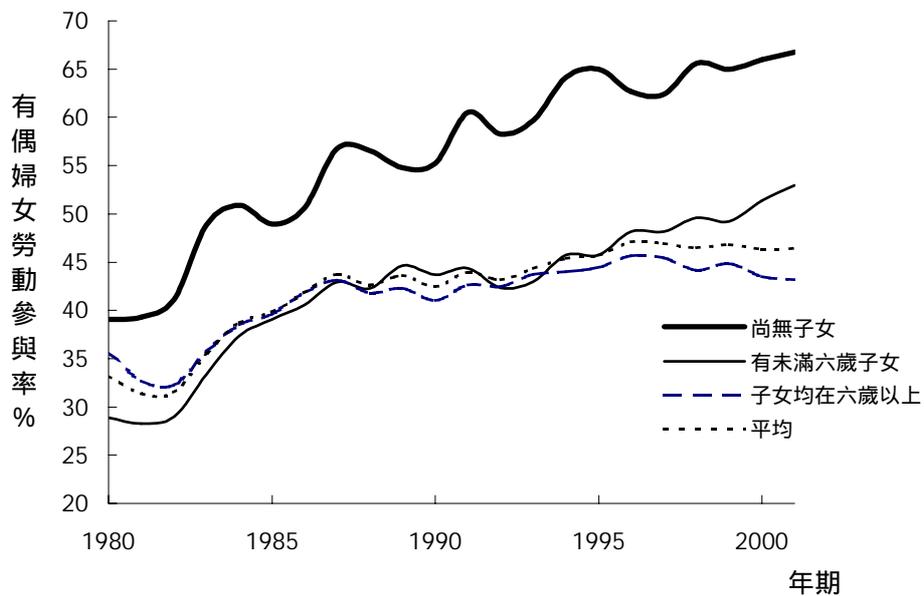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歷年「台閩地區人口統計」，內政部統計處。

¹ 許多研究發現生育率與婦女勞動參與率間呈負相關，但兩者間的因果關係則是比較有爭論的。如 Cheng(1999)使用 1952-1994 台灣的生育率與婦女勞參率作分析，並未發現兩者間存在因果關係。Nakamura and Nakamura(1994)指出，子女數越多的婦女，反而可能因經濟需求增加其勞動供給。

子女數量與子女年齡是已婚婦女參與勞動市場的重要影響因素。圖 3-3 為子女年齡別有偶婦女勞動參與率的變遷情形，平均而言，近二十年來呈現上揚趨勢，晚近則於 45% 左右起伏。尚無子女者的勞動參與率明顯高於有子女者的勞動參與率，有未滿六歲子女者的勞動參與率也逐年上升，似乎顯示幼年子女對有偶婦女勞動參與的阻力逐漸減小。至於子女均在六歲以上者勞動參與率的變遷，早期呈現上漲趨勢，晚近則似有緩降的現象。

圖 3-3 歷年子女年齡別有偶婦女勞動參與率



資料來源：「人力運用調查」(2001)，行政院主計處。

三、經濟結構

就勞動供給面而言，教育發展與生育率的下降推動了婦女參與勞動市場的能力與意願，而經濟發展與產業結構變遷產生的機會結構，可代表婦女就業需求面的考量。在經濟發展方面，光復初期政府採取先奠定農業基礎，再以農業力量推動工業發展的策略。之後對外貿易的開展、財政政策的支援，促使國內

工業得以迅速成長。表 3-2 顯示光復初期農業生產占國內生產毛額的比重超過百分之三十，之後逐漸下降，為工業取代。近十多年來則是服務業迅速擴張，到了 2001 年已佔了三分之二的比重。從表 3-3 可看出女性在第三級產業的所佔的比例逐漸升高，從 1981 年的 13.8% 上升至 2001 年的 27.2%，顯見經濟發展與產業結構轉型增加了對女性勞動力的需求並提供許多女性工作的機會。

表 3-2 台灣地區產業結構的變遷

	1951	1961	1971	1981	1991	2001
一級產業	32.28	27.45	13.07	7.30	3.79	1.95
二級產業	21.33	26.57	38.94	45.47	41.07	31.09
三級產業	46.39	45.98	47.99	47.23	55.14	66.96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第三局網頁（<http://www.dgbasey.gov.tw/dgbas03/statn.htm>）。

說明：各產業產值占 GDP 百分比。

表 3-3 歷年各行業兩性就業者比例

	1981		1986		1991		1996		2001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一級產業	13.3	5.5	11.7	5.4	9.1	3.9	7.2	3.0	5.5	2.1
二級產業	28.4	14.0	25.9	15.7	26.4	13.5	25.7	11.8	24.5	11.5
礦業、土石業	0.7	0.1	0.4	0.1	0.2	0.04	0.1	0.03	0.1	0.02
製造業	19.2	13.2	19.1	15.0	18.2	12.6	16.2	10.5	17.0	10.6
水電燃氣業	0.4	0.1	0.4	0.1	0.4	0.1	0.3	0.1	0.3	0.1
營造業	8.1	0.7	6.0	0.6	7.6	0.9	9.0	1.2	7.1	0.9
三級產業	25.0	13.8	24.8	16.6	27.1	20.1	27.9	24.5	29.3	27.2
批發零售餐飲業	10.4	6.2	10.1	7.6	11.5	8.8	11.5	10.3	11.8	11.3
運輸倉儲通信業	4.4	0.7	4.5	0.8	4.5	0.8	4.2	1.0	4.1	1.1
金融保險業	0.8	0.6	0.9	0.8	1.3	1.4	1.7	2.0	1.9	2.5
工商服務業	0.6	0.4	0.7	0.5	1.0	0.8	1.4	1.2	2.1	1.5
社會個人服務業	6.1	4.9	5.9	5.7	6.6	7.0	6.9	8.7	7.2	9.6
公共行政業	2.6	1.0	2.6	1.2	2.3	1.2	2.3	1.3	2.2	1.3
總計	66.7	33.3	62.4	37.6	62.6	37.4	60.8	39.2	59.3	40.7

資料來源：人力資源調查(2001)，行政院主計處。

說明：單位為百分比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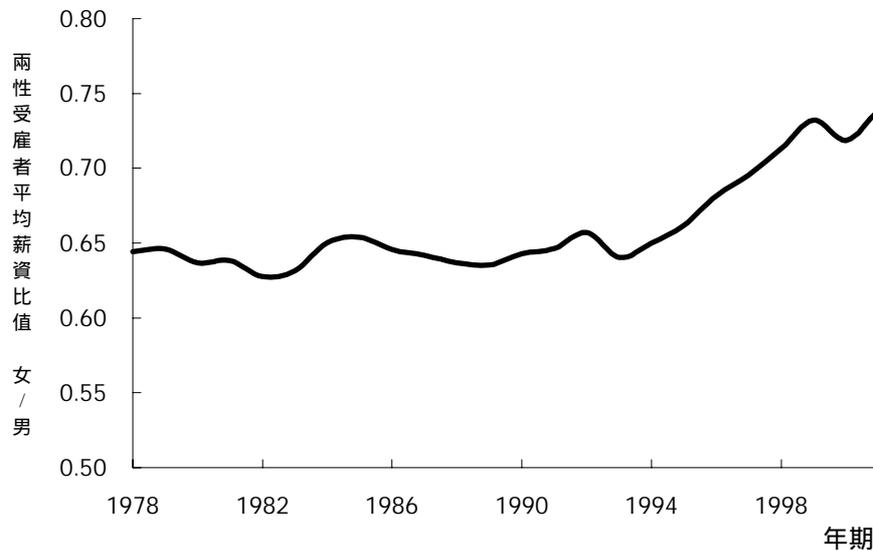
四、性別薪資差異

雖然女性勞動供給在質與量上都與男性逐漸拉近，但其在勞動市場上的經濟地位並未獲得明顯改善，兩性在工作報酬上的差別待遇，廣泛存在於各行各業（蔡青龍與張美陽，1996）。對於兩性薪資差異的來源，最常見的就是兩性人力資本差異與性別歧視；人力資本論觀點指出，平均而言，女性人力資本的投資與累積較男性少，因此有較低的薪資。而在控制了年齡、工作經驗、教育程度等個人特徵與人力資本變項對薪資差異的影響後，其餘部分則可視為是性別歧視所致（曾敏傑，2002）。

蔡青龍與張美陽（1996）比較 1978 年與 1992 年的兩性受雇者平均薪資，指出除了高年齡層受過高職以上教育者外，兩性薪資差異並未隨著時間而有全面性的改善。曾敏傑（2001）以台灣地區 1982、1992 及 2000 年的全職非農業就業人口為研究對象，建構一包含人力資本、工作結構、家庭限制及擁擠理論變項的模型，用以解釋兩性間平均薪資的差異及變遷。研究結果發現，男性平均薪資較女性多 30% 左右，但此差距在 1982 至 2000 年間已有逐漸縮小的趨勢。圖 3-4 為歷年兩性受雇者平均薪資之比值，總體上來看兩性薪資差異有逐漸減小的趨勢，1978 年女性受雇者平均薪資僅達男性的 64%，到了 2001 年則為 74%，預期未來將更接近。兩性薪資差異逐漸縮小代表著社會對女性工作者的肯定與接納，對於婦女勞動參與而言將是一股拉力。

從以上光復後台灣教育、人口、經濟結構等的變化來看，社會環境的變遷趨勢整體而言是有利於婦女參與勞動市場的；教育擴張提升了女性的人力資本，子女數量的減少使得女性有更多的非家庭照顧時間可運用，經濟發展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性別刻板印象也不若以往強烈。在下一節中，我們將更進一步討論社會變遷對婦女勞動參與的影響。

圖 3-4 歷年兩性受雇者平均薪資之比值



資料來源：歷年「人力運用調查」，行政院主計處。

第二節 社會變遷與婦女勞動參與

鑑於過去個體資料的分析相當豐富，此處就總體資料分析說明近三十年來（1971-2001年）台灣婦女勞動參與率的變化。我們以在學率、平均教育年數、有偶率代表人力資本與家庭生命週期因素，以人均實質所得以及女性相對於男性的工資反映經濟發展與社會的性別角色期望。我們將個人條件變項視為「推力」，呈現的是女性的人力資本與家庭限制，結構變項則視為「拉力」，呈現的是社會對於女性勞動的「接納」與「需求」。

一、模型設定

雖然前述指出影響婦女勞動參與的諸多因素，但使用總體資料來說明時卻

受到相當的限制。一方面是長期資料取得困難，另一方面則是總體資料變項的內涵不夠明確。表面上我們可以使用年齡別的生育率、結婚率、在學率、平均教育年數等變項，來說明婦女勞動參與率的變遷（如張素梅，1988；劉鶯釧，1994），以對應於使用個體資料中之有無幼年子女、是否已婚、是否仍在學、以及受教育年數等變項，來說明是否參與勞動。但總體資料中的年齡別生育率、結婚率均是動態資料，而勞動參與率卻是靜態資料，如此以發生率（生育率、結婚率）來說明盛行率（勞動參與率）的變化，其影響機制恐不易連結（個體分析則沒有此一問題，因為所有變項均是靜態資料）。因此，我們乃以有偶率代替結婚率，而捨棄生育率變項；捨棄生育率變項除了其為發生率的考慮之外，另一個原因是低年齡組人口的婚姻多因懷孕而來（絕大部分 15-19 歲組以及部分 20-24 歲組），因此年齡別生育率與年齡別有偶率的相關係數逼近於 1，同時考慮兩個變項將產生共線性問題，導致不穩定的估計結果。

除了有偶率、在學率、平均教育年數這些個人條件（雖然用總體資料來表示）變項之外，我們另外考慮了兩個結構性變項：分別為女性相對於男性的工資，以及實質人均所得。我們將個人條件變項視為「推力」，呈現的是女性的人力資本與家庭限制，結構變項則視為「拉力」，呈現的是社會對於女性勞動的「接納」與「需求」。如果女性的工資相對於男性的工資愈高，代表社會對於女性勞動力的接納度愈高²；而所得成長一方面代表經濟成長，勞動力需求擴大，二方面表示生活水準提高，使得女性必須投入工作才能滿足個人或家庭的經濟需求。

由於不同年齡組人口處於不同的生命階段，因此影響是否參與勞動的因素也不相同。例如絕大部份中、高年齡組人口已離開學校，難有是否就學影響是否就業的情況，但是否就學對低年齡組人口就相當重要。對於 15-19 歲年齡組人口，我們設定的模型只考慮在學率與有偶率，此一年齡組人口多數未完成學業，因此計算平均教育年數沒有意義；又其正在進入勞動力市場，相對工資與經濟

² 雖然相對工資的上漲可能反映的是相對人力資本的增加，也就是女性的教育程度與男性教育程度差距縮小之故，但如果社會不能接納女性參與勞動，或者不能接納女性取得較高職位，則兩性教育程度差距縮小並不必然導致工資差距隨之縮小。換句話說，我們利用此一指標來反映「工作性別刻板印象」的變化。

成長高低也不容易影響其是否參與勞動。20-24 歲組人口進入適婚年齡，過去更是結婚的高峰年齡，因此考慮有偶率變項。另外，20-24 歲組仍有相當比例的人口在學，因此我們納入在學率變項，此一年齡組有相當部分的人已完成學業，因此平均教育年數、相對工資、以及經濟成長均納入。25-29 歲組考慮的變項與 20-24 歲組相同，30 歲以後仍在學者少之又少，且已無相關資料，因此捨棄此一變項。有偶率變項的上限年齡則設定為 49 歲，主要是考慮 50 歲以前與之後的有偶率內涵相當不同：年輕人口的有偶率反映的是累積的結婚人數，用 1 減去有偶率可約略代表未婚傾向；高年齡組人口的有偶率則另加上喪偶因素，也就是說，50 歲之後女性的喪偶機率大增，造成有偶率逐漸下跌，而我們不認為喪偶將影響高齡人口的勞動參與情形，因此不納入有偶率變項。本文使用 1971-2001 年間的時間數列資料作分析，各變項之資料來源與計算方式整理如表 3-4，各年齡組納入的自變項整理如表 3-5。

由於勞動參與率必須界於 0 到 1 之間，因此我們使用 Logistic function 來設定迴歸方程式。如前所述，不同年齡組勞參率之影響因素不同，因此我們進行年齡別分組迴歸，但允許各迴歸式之間的殘差項產生相關，因此使用 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s model 進行資料的配適。又因為分析的資料為時間序列資料，因此考慮第一階的自我相關（first order autocorrelation）。分析模型如下：

$$\ln\left(\frac{FLFPR_i}{1-FLFPR_i}\right) = X_i\beta_i + \varepsilon_i$$

$$\varepsilon_{i,t} = \rho_i\varepsilon_{i,t-1} + u_{i,t}$$

$$E[\varepsilon_i\varepsilon_j] = \sigma_{ij}\mathbf{I}$$

其中 $FLFPR_i$ 代表第 i 年齡組的勞動參與率， X_i 代表第 i 年齡組的自變項矩陣， β_i 代表第 i 年齡組的各自變項迴歸係數矩陣（各年齡組之自變項內容如表

3-5), ρ_i 代表第 i 年齡組的第一階自我相關校正係數, σ_{ij} 為各方程式之殘差項的相關矩陣, I 為單位矩陣。

表 3-4 變項與資料來源說明

變項	測量指標	資料來源
婦女勞動參與率	女性勞動力人口/女性十五歲以上民間人口	1971-1977--台灣省勞動力調查報告(台灣省政府社會處) 1978-2001--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行政院主計處)
女性有偶率*	女性有偶人口/女性年中人口比例	台閩地區人口統計(內政部)
女性在學率	女性在學人口/女性十五歲以上民間人口	中華民國教育統計(教育部) 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行政院主計處)
女性教育程度*	女性民間人口平均教育年數	人力運用調查(行政院主計處)
兩性相對工資	女性受雇者平均工資/男性受雇者平均工資	人力運用調查(行政院主計處)
人均所得	國民生產毛額/年中總人口數	國民所得年刊(行政院主計處)

說明：1. 各變項均區分五歲年齡組計算。

2. * 1971-1975 年有偶率以及 1971-1977 平均教育年數的數值以插補法計算而得。

表 3-5 各年齡組迴歸式納入之自變項

變項	年齡									
	15-19	20-24	25-29	30-34	35-39	40-44	45-49	50-54	55-59	60-64
截距 Cons										
有偶率 FMAR										
在學率 SR										
平均教育年數 EDU										
相對工資 RW										
人均所得 RGDP										

二、實證結果

實證分析結果如表 3-6。15-19 歲組人口的在學率一如預期與勞動參與率呈

負向關係，就學率愈高，勞動參與率就愈低。不過 15-19 歲的有偶率卻與勞動參與率呈正相關，二者同方向變動可能是因為均受在學率影響之故，也就是說，在學率的提高一方面使得有偶率下降，另一方面也使得勞動參與率下降，對 15-19 歲的女性來說，有偶率也許並非解釋其勞動參與變化的適當變項。

20-24 歲的女性大部分已完成學業，開始進入就業市場。結婚的年齡愈來愈晚、教育程度愈來愈高，將使得此一年齡組的勞動參與率上升，而高等教育擴張促使在學率的增加，又將使得勞動參與率下跌。表 3-6 的結果驗證此一觀察：有偶率、在學率、以及平均教育年數的影響方向一如預期，且均達顯著水準。另外，相對工資水準變項未達顯著水準，而經濟成長變項的影響方向為負，可能是因為經濟成長對 20-24 歲組人口來說，其影響力作用於在學率的增加，而非勞動參與率的增加，如此使得二者產生負相關的結果。

25-29 歲雖然有偶率逐年下降，但此一階段一直是女性結婚的高峰期，因此在時間軸上的變化幅度未如前面兩組人口來得大，對於勞動參與率的提升未產生顯著的效果，而在學率、平均教育年數與經濟成長變項則均有顯著的影響。

30-34 歲正值家庭中有幼年子女需要照顧的階段，婦女容易受到家庭羈絆而增加退出勞動市場的機率。其有偶率對勞動參與率的影響與預期相符，晚婚晚育的結果使得勞動參與率逐漸上升。有趣的是此一年齡組的教育程度與與勞參率呈負相關，是否代表教育程度的提高使得父母越重視子女幼年養育，因此願意暫時退出勞動市場，值得使用個體資料做進一步的分析。

35-39 歲與 40-44 歲組的有偶率均未產生顯著的影響，可能是因為此一階段的有偶率在時間軸上的變化不大之故，教育程度與經濟成長才是重要的影響原因。如果就個別家庭來看，此時大多數家庭的子女已脫離幼兒時期，婦女可以再度投入勞動市場，而人力資本越高者，進入的機率愈高。45-49 歲組也有類似的情形，顯示教育程度提升對於中齡組勞動參與率的提升有相當的助益。

50 歲以後逐漸步入老年，年齡歧視、健康狀況、退休等原因是影響婦女就業的主因，此時繼續留在勞動市場的女性，不是位居要職者，就是因為經濟需要而不得不繼續工作。由於後面三個年齡組的教育程度對勞動參與率產生負向

的影響，似乎顯示高齡就業者的主要決定因素不在於本身人力資本的成長，而在於其他因素。結構變項中，相對工資僅在 50-54 歲組產生顯著的影響，經濟成長則對每一個年齡組均有顯著的影響。

表 3-6 各年齡組之迴歸參數估計值

年齡	15- 19	20- 24	25- 29	30- 34	35- 39	40- 44	45- 49	50-54	55-59	60-64
截距 Cons	0.464*	0.685	-2.194***	3.093**	0.761	-0.678	1.438**	-0.873***	-1.603***	-2.964***
有偶率 FMAR	0.107***	-0.020**	0.001	-0.040***	-0.014	0.002	-0.028***			
在學率 SR	-0.030***	-0.013***	-0.013***							
平均教育年 EDU		0.068*	0.169***	-0.072*	0.033*	0.072***	0.104***	-0.027	-0.074**	-0.0002
相對工資 RW		-0.001	0.001	0.004	-0.002	-0.006***	0.001	-0.004***	0.001	-0.0002
人均所得 RGDP		-0.001*	0.002***	0.003***	0.002***	0.002***	0.001	0.003***	0.003***	0.005***
Adjusted R ²	0.965	0.853	0.984	0.947	0.947	0.929	0.895	0.919	0.875	0.878
自我相關檢測 D-W	0.425	0.667	1.680	1.497	1.608	1.133	0.535	1.607	2.105	0.798
自我相關校正 ρ	0.423	0.519	0.204	0.603	0.586	0.713	0.630	0.794	0.854	0.657

* 代表 5% 顯著水準，** 代表 1% 顯著水準，*** 代表 0.1% 顯著水準。

第三節 小結

本章首先使用高級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學齡人口在學率、育齡婦女總生育率以及各產業產值占 GDP 百分比說明光復後台灣的教育、人口、經濟變遷。續以 1971-2001 年的總體資料探討年齡別婦女勞動參與率變化的影響因素。迴歸結果指出在學率對低年齡組勞參率存在負向作用，反映教育擴張降低了 15-29 歲的婦女勞動參與率。隨著早期的教育普及以及晚近的教育擴張，女性平均教育年數逐漸提升，兩性教育程度差距大幅縮短。教育程度的提升代表女性人力資本與潛在薪資能力的增加，教育程度越高，市場工作時間價值越高；相對的，不投入勞動市場的成本也越高，在效益最大化的考量下，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越可能投入勞動市場。與其他研究結果相似，本文研究結果顯示平均教育年數的提升將增加婦女勞動參與率。

但婦女是否參與勞動不只是個人因素與偏好完全決定，女性進入婚育階段後，常面對工作與家庭照顧的兩難困境。我們以有偶率總括婚育以及家庭照顧需求，檢視其對於婦女勞動參與率的影響。結果顯示，除了 15-19 歲組外，有偶率對婦女勞參率均有負向作用，婚育以及家庭照顧仍是影響婦女勞動參與的重要因素。

至於結構面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用以衡量總體經濟狀況的人均所得對婦女勞動參與率有顯著正向的作用，與先前研究結果相符，代表經濟成長擴大了對婦女勞動參與的需求以及婦女就業機會。唯相對工資在大部分的年齡組均未產生顯著的影響效果，可能是相對工資的變化與教育程度的變化與時並進，其只能反映兩性相對人力資本的變化，無法反映「男主外、女主內」的刻板印象之變化。

最後值得再次強調與說明的是：總體資料的分析的優點是描繪整體平均水準的變化趨勢，用以掌握重要的影響因素，不過總體資料卻把個體間的差異消除，使得影響的「機制」不容易顯現出來，但個體資料經常只能就同一時點來比較，對於變遷趨勢的掌握又顯得較為薄弱；所以唯有取得長期觀察的個體資料，對於相關議題的討論才能產生明確的結果。

光復後台灣的教育、人口、經濟結構變遷皆朝向有利於婦女勞動參與的方向發展，加上傳統觀念與兩性刻板印象的式微，已婚婦女雖然不見得被鼓勵參與勞動市場，但似乎已不再被限制於單一家庭角色中。然而更值得關切的是，隨著女性人力資本的提升、子女數量的減少，家庭對婦女工作的羈絆是否減輕了，婦女是否真正能擁有在職場上充分發展的空間而免於中斷型的職業生涯。換句話說，婦女勞動參與的歷程隨著社會變遷產生了什麼樣的變化，在下一章中，我們將探討婦女就業型態與就業歷程的變化。

第四章 八零年代以來的婦女勞動參與歷程

上一章我們利用總體資料分析 1971-2001 年間台灣婦女勞動參與率的變化，結果與預期相符，女性平均教育年數、經濟成長對婦女勞動參與率有促進作用，代表家庭照顧負擔的有偶率對婦女勞動參與率則有負向作用。隨著教育持續擴張與生育率降低，提升了婦女勞動參與率，但此並不表示其在家庭與工作間的衝突就會降低；生育任務仍必須依靠女性，子女照護的問題也仍然存在。除非婦女的就業型態也產生變化，否則婦女勞動參與其實沒有多大的變遷。本章首先利用 1965 年以來的婦女勞參率資料，轉換時期率為世代率，用以呈現時期率可能產生的錯覺，其次利用 1980、1990 以及 2000 年的「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資料呈現婦女勞動參與的類型與歷程及其變遷趨勢。

第一節 婦女勞動參與歷程：時期別與世代別

個人所處生命週期階段與其年齡有相當程度的關係，故年齡別婦女勞動參與率的變化常被用以說明婦女勞動參與歷程的變化。例如女性在 15-24 歲的青年期，屬於進入勞動市場的主要年齡，25-29 歲時，大部分婦女會遇到工作與家庭角色的兩難困境，難以兼顧者，或延遲參與勞動市場，或在婚育時退出勞動市場。到了中年期（30-44 歲），兒女大多已經上學或長大，許多婦女再度投入勞動力。45 歲以後逐漸步向老年期，身體狀況、技術退化和年齡歧視等因素可能促使其退出勞動力（蔡青龍，19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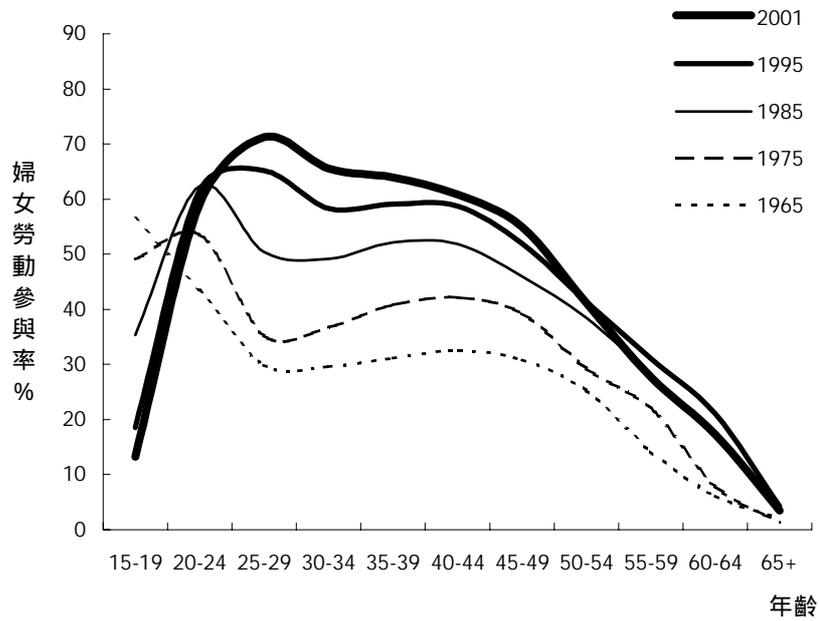
從歷年（1965-2001）年齡組別之婦女勞動參與率的變化（圖 4-1），我們可以發現早期的年齡別婦女勞動參與率約呈 M 字型雙峰分配，中間的下凹部分常被解釋為因婚育造成中斷就業的結果；晚近則逐漸朝向單峰分配發展，一般認為乃是教育擴張使得女性的人力資本提昇，中斷就業的機會成本提高之故。然而圖 4-1 其實不能代表女性真正的勞動參與歷程，因為圖 4-1 中每個年齡組人口

是不同世代 (cohort, 或譯為年輪) 的人口。當我們討論婦女勞動參與歷程的變化時, 指的是一個 (或一群) 女人一生的勞動參與; 欲呈現真正的勞動參與歷程, 須以世代的角度觀察追蹤一群同時出生的婦女, 記錄其勞動參與歷史, 才能得知其全貌。

在國內缺乏相關長期追蹤資料的限制下, 我們使用時期別總體資料來組合世代別婦女一生的勞動參與歷程。由於年齡 (Age)、時期 (Period) 與世代 (Cohort) 三者間具有 $C = P - A$ 的形式關係, 因此我們可以將時期別資料轉換為出生世代別資料, 例如 1946-50 年出生的女性在 1970 年時是 20-24 歲, 我們就以 1970 年 20-24 組的婦女勞參率作為該群女性勞動參與情形的代表; 到了 1980 年時, 她們的年齡對應為 30-34 歲, 我們就以 1980 年 30-34 歲組的勞參率作為當時總體勞動參與情形的指標, 其餘依此類推。轉換後的情形如圖 4-2, 由於我們取得的時期別資料期間為 1965-2001 年, 因此 1930 年代出生的世代, 其勞動參與率的鋪陳只能自 25-29 歲組開始, 爾後隨著出生年代往後推移, 可得的起始年齡別資料也依序往前推移; 而高年齡組資料面臨的情況恰好相反, 例如 1960 年代出生的世代必須截斷於 35-39 歲組, 而 1970 年代出生的世代則必須截斷於 25-29 歲組。雖然如此, 圖 4-2 仍可呈現不同世代間的變化趨勢, 我們可以發現不同世代女性勞參率的變化均呈現雙峰分配, 只是峰谷的深度有縮小的趨勢, 但峰谷是否會消失而終呈單峰分配其實仍不明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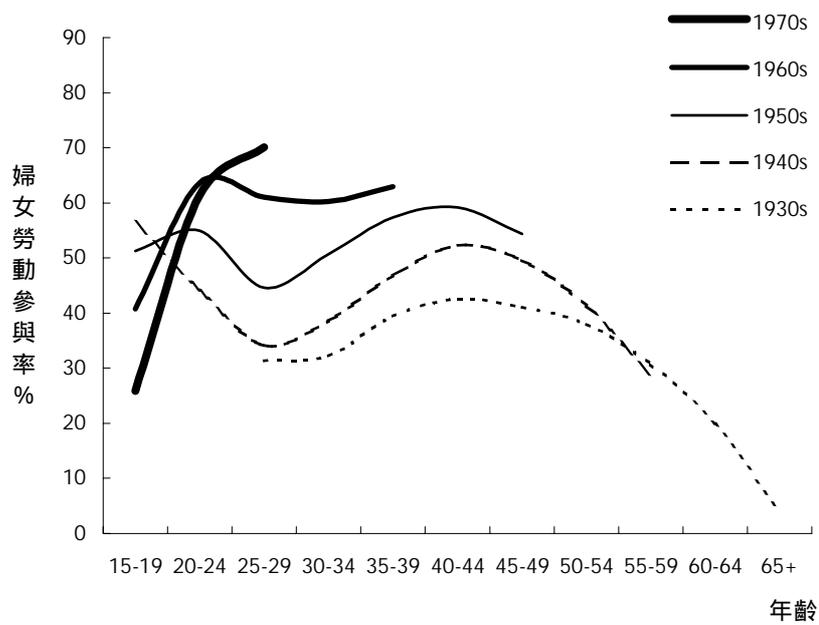
圖 4-2 同時說明不同世代間婦女勞動參與歷程的變化。1930 年代出生的婦女雖然缺乏 15-19 歲組的資料, 我們相信其與 1940 年出生的世代一樣, 均以 15-19 歲為勞動參與的第一個峰點。1950 年代以後出生之世代則因為教育普及與教育擴張之故, 使得 15-19 歲組的勞動參與率明顯下滑, 第一個峰點移至 20-24 歲。25-29 歲長期以來一直是婚育的高峰期, 婦女勞動參與率乃在此處快速下降; 不過圖 4-2 同時顯示峰谷年齡正在往後移動當中, 對 1960 年代出生的婦女來說, 峰谷期間已從 25-29 歲蔓延到 30-34 歲組, 正好對映晚婚與生育率下跌的趨勢。與已婚女性相較, 未婚女性因缺乏另一半的經濟支持, 必須持續參與勞動以獲得經濟來源, 而子女數量縮減使得生育對婦女就業的影響期間縮短, 婦女再就

圖 4-1 歷年時期年齡別婦女勞動參與率



資料來源：歷年「人力資源調查」，行政院主計處。

圖 4-2 歷年出生世代年齡別婦女勞動參與率



資料來源：同圖 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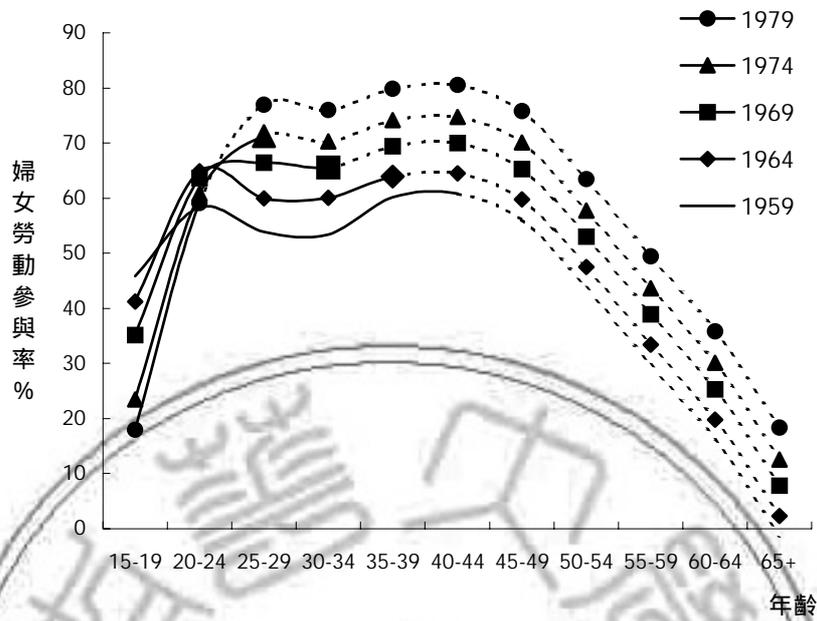
業的時間得以提前，如此一方面延後退出勞動市場，一方面加快返回勞動市場，乃使得峰谷的跌幅降低，而蔓延的期間拉長。

從圖 4-2 的變化趨勢即可了解圖 4-1 單峰分配的由來：當年輕世代的低年齡組人口（25-29 歲）尚未完全退出勞動市場，而年長世代接續年齡的婦女（30-34 歲組）已開始二次投入勞動市場，乃使得時期別資料（圖 4-1）中的 25-34 歲組的峰谷消失。換句話說，當世代別的勞動參與歷程產生變化時，有時並不能在時期別資料上真正反映出來。我們進一步以圖 4-3 與 4-4 為例來說明，圖 4-3 為 1959-1979 年出生世代年齡別婦女勞動參與率變遷情形，同樣用以表現不同世代女性一生勞動參與歷程。實線部分為時期別資料轉換而來，虛線部分年齡組資料則是利用相鄰世代資料年齡組間差異平移而得（虛擬資料）。從圖 4-3 中可以看出晚近世代第一個高峰點向後推移，峰谷降幅縮小，二次高峰的幅度益趨明顯，如此趨緩的雙峰分配情形隱含於時期別資料中（圖 4-4）；圖 4-4 顯示勞動參與的情形逐漸由雙峰轉為單峰分配，如 2001 年圖形呈現單峰分配，我們可視其 20-39 歲年齡組資料為圖 4-3 中 1964-1979 年出生世代相對應年齡組資料的組合，也就是說單一橫斷面時期別資料隱含了不同世代的資料。若單只就圖 4-4 來看，容易產生晚近世代婦女連續就業的錯覺，但從圖 4-3 中可看出，婦女勞動參與歷程可能仍維持 M 字型分配，只是在步調上產生變化。

另外，世代別資料轉換至時期別資料所呈現的單峰分配情形（如圖 4-4，2006 年資料）為世代變遷的過渡現象；從時期、世代、年齡三者間的形式關係來看，時期別資料與世代別資料分配情形應有高度相似性，因此圖 4-3 與 4-4 的情形是世代交替下的結果。如果世代別資料長期呈現 M 字型分配，那麼可預期時期別資料也將呈現類似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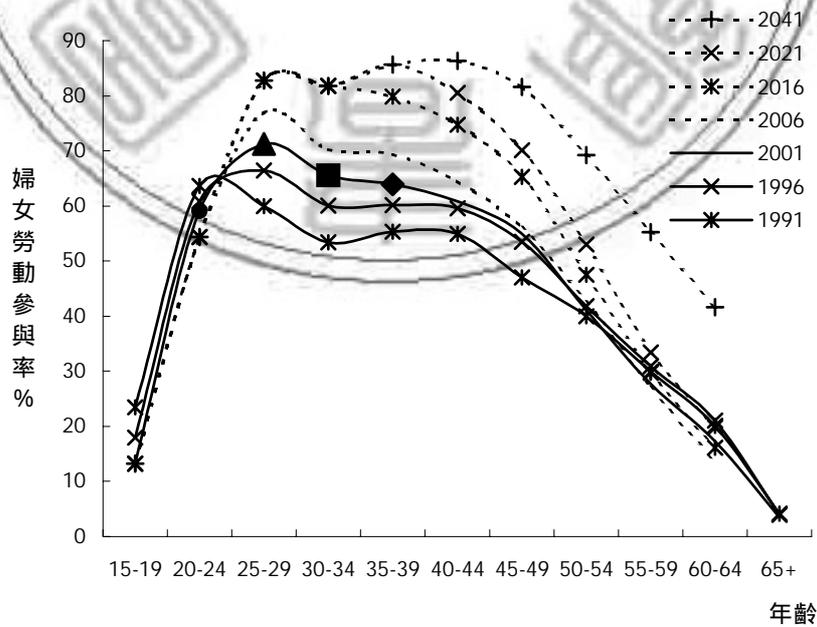
簡而言之，就總體資料來看，橫斷面資料不易看出婦女勞動參與歷程的實際變遷情形，而世代別資料較能透露出婦女勞動歷程的變化。

圖 4-3 出生世代年齡別婦女勞動參與率（虛擬）



資料來源：實線部分同圖 4-1；虛線部分為虛擬資料。

圖 4-4 時期年齡別婦女勞動參與率（虛擬）



資料來源：實線部分同圖 4-1；虛線部分為虛擬資料。

第二節 婦女勞動參與類型及其變遷

上一節我們利用歷年橫斷面資料來轉換成類似縱貫性的資料以初步瞭解婦女勞動參與歷程的變化，但由於總體資料透露的訊息有限，因此接下來我們進一步利用個體回溯性資料來瞭解婦女勞參類型與歷程的變化。首先介紹婦女勞動參與的類型，其次說明資料來源，最後描述婦女勞動參與類型的變遷。

一、婦女勞動參與類型

婦女是否參與勞動及其就業的型態與其所處家庭生命週期有關，Sorensen (1983) 將婦女勞參歷程與家庭生命週期做結合，將初婚以及生育胎次作為家庭生命週期階段的分界點，以婦女在「婚後至第一胎」、「第一胎至最後一胎」、「最後一胎之後」是否就業為判準，來組合婦女勞參歷程，並區分為以下四種類型：傳統型、中斷型、雙軌型、不穩定型（如表 4-1）。

表 4-1 婦女勞動參與類型分類

勞動參與類型	勞動參與歷程
傳統型	結婚退出後未返回勞動市場 生育第一胎後未返回勞動市場
中斷型	結婚後退出勞動市場，在最後一胎生育後返回 生育第一胎時退出勞動市場，在最後一胎生育後返回
雙軌型	婚育期間從未退出勞動市場 結婚時退出，在最後一胎出生前返回 生育第一胎時退出勞動市場，在最後一胎生育前返回
不穩定型	多次進出勞動市場 生育第二胎或更晚胎次時才離開勞動市場 其他

資料來源：Sorensen (1983)

該研究中並討論婦女的勞動參與歷程與個人特徵的關係；人力資本越高者，退出勞動市場的機會成本越高，通常該類婦女不會輕易放棄就業，即使因

生育因素暫時退出勞動市場，也傾向儘早復職，以減低損失。一如預期，該篇研究結果顯示教育程度越高者越傾向雙軌型的勞動參與類型。而年紀越大者，越容易落入傳統型勞動參與類型；代表年長世代受傳統兩性分工的觀念影響較深，傾向於在婚後退出勞動市場，扮演全職家庭婦女角色。

就中斷型勞動者來看，離職的時機也受到個人特徵的影響，如婚前職業地位越高者，退出勞動市場的時機越晚，此反映在她們結婚時多傾向不退出，而延後至生育時才退出勞動場。復職時機方面，通常視晚婚者為教育程度或工作經驗較長者，人力資本較高，預期離職後會儘早復職。但該研究結果顯示早結婚者較晚結婚者提前復職，這或許是因為前者婚前累積的經濟資本較低，而傾向提前重返勞動市場以分擔家庭經濟需求，並為養育下一代奠定經濟基礎。

簡文吟與薛承泰（1996）則著眼於有學齡前子女的已婚婦女的就業型態與影響因素，針對「婚前」、「婚後至子女出生前」、「最小子女尚未進入幼稚園前」、「最小子女尚未入小學前」四個階段婦女是否就業，將婦女就業型態分為五類：不中斷就業、生育中斷就業、婚後中斷就業、從未就業與其他。比較婦女個人特性後發現年輕世代、教育程度較高、婚前職業地位越高者越可能連續就業。生育子女數較多則易於生育後放棄工作，而不利於婦女連續就業。母親工作經驗的有無對婦女勞參型態也有顯著影響，母親有工作經驗，則下一代連續就業的機會也較高，似乎代表著母親透過社會化過程影響女兒未來的就業行為。

本文參考上述兩篇研究的的分類方式，將「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問卷中有關婦女勞動參與歷史的十一個選項區分為四類勞參類型，如表 3-2，其中正號（+）代表有參與勞動市場，負號（-）代表沒有參與勞動市場。

二、資料來源

國內目前有關婦女勞參行為較完整的個體性資料當屬行政院主計處的「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該項調查提供有關台灣地區婦女結婚、生育以及勞動參與方面資料，調查對象為十五歲以上自由從事經濟活動之女性人口。自 1979 起至

1988 年間每年隨同人力資源調查附帶辦理。但之後由於經費限制改為不定期辦理，於 1990 年、1993 年與 2000 年分別各舉辦過一次。本研究目的著重社會變遷下婦女勞參歷程的變化，我們選取 1980、1990 與 2000 年樣本資料來說明變遷的情形。

表 4-2 婦女勞動參與類型定義

婚前	結婚	生育	受訪時	勞參歷程	勞參類型	
+	-	-	-	+	曾因結婚離職，現有工作	中斷型
+	+	-	-	+	曾因生育離職，現有工作	
+			-	+	曾因其他原因離職，現有工作	
+	+	+	+	+	婚前至今一直有工作	持續型
-	+	+	+	+	婚前無，婚後至今一直有工作	
+	-	-	-	-	曾因結婚離職，至今一直未工作	傳統型
+	+	-	-	-	曾因生育離職，至今一直未工作	
-	-	-	-	-	婚前至今一直未工作	
+	-	-	+	-	曾因結婚離職，且曾恢復工作，現未工作	其他
+	+	-	+	-	曾因生育離職，且曾恢復工作，現未工作	
+			-	-	曾因其他原因離職，至今未工作	

說明：離職的定義為離開勞動市場連續超過三個月以上

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問卷中有關婦女勞參歷程及婚育史的紀錄是以回溯性方式調查。考量年輕受訪者尚未經歷完全的婚姻與生育歷程，納入分析可能產生選擇性偏誤的問題（如尚未生育者不會勾選因生育中斷的勞參類型，但未來可能因生育而中斷就業），故本文僅選取 40-49 歲年齡組為研究對象。選取此年齡組的原因在於 40 歲以後，大多數女性已完成婚育，其勞參歷程與家庭生命週期能較完整地紀錄。將年齡截斷於 49 歲一方面是考慮足夠樣本數，另一方面則是避免因年齡組距加大而產生年期效果的影響。換句話說，三個時期的樣本分別代表 1931-1940，1941-1950，1951-1960 三個出生世代的女性，而她們的工作

年齡正值台灣光復後社會變遷的進程，透過三組世代的比較分析，相信能反映出社會變遷下婦女勞參類型的變化。

在樣本數方面，1980年、1990年與2000年資料分別為3620、3850與5418人。首先我們透過表4-3的描述統計以瞭解三個世代的樣本分佈情形，就教育程度的變化來看，年長世代（1980年資料）的女性所受教育相當有限，絕大部分僅有國中以下的學歷，一方面是當時教育並不普及，二是與重男輕女的時代背景有關。年中世代（1990年資料）的女性，平均教育程度已呈現上升趨勢，但僅有國小教育程度者仍有七成左右。1968年起，台灣推行九年義務教育，普遍提升了人民的教育水平，從2000年資料的數據中可看出國中以上教育程度者已佔了五成以上，高中職以上者從1980年的5%上升至2000年的38%，教育普及的結果使女性勞動力的素質明顯提升。

婚姻狀況方面，未婚的比例稍有增加，但大部分受訪者仍有過結婚經驗，初婚年齡也稍有提高。已婚者子女數則從1980年世代的4.3個降為2000年世代的2.6個。

為反映三個世代婦女的就業背景，故在此僅選擇受訪者離職前的職業與從業身份來代表當時婦女勞參的情形。離職前職業的分配上，依據行職業標準分類粗分為白領人員、買賣及服務人員、農林人員、生產操作與體力工四類。其中白領人員包含行政及主管人員、專門性、技術性等相關人員以及監督及佐理人員，因考量到部分職業樣本數過少，影響代表性，因而將上述職業合併為白領人員。1980至2000年間，買賣及服務人員、農林人員所佔比例逐漸下降，以農林人員降幅最大。白領人員與生產、操作與體力工的比例提升，經與職業標準分類比照後，發現白領人員當中，增加的部分在於事務工作人員，包括打字員、書記員等文書佐理類工作，行政主管人員在三年中均佔相當少數。生產、操作與體力工方面，增加者多為紡織、成衣、裝飾品製造類等操作性工作，反映出當時台灣手工製造業對婦女人力的需求。

表 4-3 1980 年、1990 年、與 2000 年 個人特質與就業狀況

樣本特質	1980	1990	2000
教育程度	N=3620	N=3850	N=5418
國小及以下	88.2	71.8	43.4
國中	6.4	9.7	18.6
高中(職)	3.4	11.4	26.4
大專及以上	2.0	7.1	11.6
平均教育年數	4.6	6.8	9.0
婚姻狀況	N=3620	N=3850	N=5418
未婚	0.7	1.9	4.2
有偶(含同居)	93.2	89.1	87.0
離婚、分居	1.4	3.4	4.4
喪偶	4.8	5.6	4.4
初婚年齡	N=3596	N=3776	N=5193
未滿 20 歲	26.0	24.3	17.5
20 至 24 歲	61.0	56.7	52.8
25 至 29 歲	11.1	16.0	24.2
30 歲以上	1.9	3.0	5.5
平均初婚年齡	21.4	21.9	22.9
子女數目	N=3596	N=3776	N=5193
0 個	1.6	1.8	2.2
1 至 2 個	10.0	26.4	45.0
3 至 4 個	47.7	59.5	49.5
5 個以上	40.7	12.3	3.3
平均子女數目	4.3	3.1	2.6
婚(育)離職前職業	N=638	N=1238	N=1273
白領人員	12.5	20.4	29.6
買賣及服務人員	21.0	20.7	12.7
農林人員	30.6	16.1	6.1
生產、操作及體力工	35.9	42.8	51.6
婚(育)離職前從業身份	N=638	N=1238	N=1273
僱主及自營作業者	5.8	5.9	4.0
政府僱用者	8.5	8.5	4.6
私人僱用者	55.8	67.8	84.2
無酬家屬工作者	29.9	17.8	7.2

資料來源：1980、1990、2000 年「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原始資料。

說明：1. 數值單位為百分比數，經加權計算。

2. 初婚年齡及子女數目數值之計算排除未婚樣本。

3. 平均教育年數是由教育程度轉化計算而得，不識字：0 年，自修：3 年，小學：6 年，國中：9 年，高中職：12 年，大專及以上：16 年。

4. 白領人員包含行政及主管人員、專門性、技術性等相關人員以及監督及佐理人員。

從業身份的變化方面，無酬家屬工作者明顯減少，自營作業者與受政府雇用者的比例也不高，大部分為受私人雇用者，反映經濟型態已從個體式的生產組織轉向工業化集中型、規模生產的型態。

三、婦女勞動參與類型的變遷

除了婦女勞動參與數量上的增加，婦女就業者個人特質與就業狀況的變遷外，婦女就業型態的變遷情形也是值得關注的，如果婦女就業型態沒有變化，代表家庭與工作間的衝突仍未降低，婦女一生的勞動參與沒有多大的變遷。就表 4-4 三個世代的勞動參與類型分佈比例來看，傳統型有減少趨勢，其中「婚育離職後未返回工作」者的比例有小幅上揚，「從未工作」者的比例大幅降低（年長世代有 38.5% 的已婚婦女從未工作，年輕世代僅有 7.9%）。

中斷型呈現增加的趨勢，但變化的幅度不大。其中因婚育或其他原因中斷就業，之後又再投入勞動市場者的比例均小幅上升。持續型勞動參與類型的變遷方面，年長世代中有 42.3% 的已婚婦女持續就業，年輕世代則為 34.9%；主要是「婚前無工作，婚後持續工作」者比例下降所致，而「婚前至今持續工作」者的比例則變化不大。

如果婚育對婦女勞動參與的影響減小的話，婦女就業類型的變遷趨勢預期會呈現傳統型與中斷型減少而持續型增加的趨勢；然而，將傳統型與中斷型兩類合併計算，二十年來皆佔了一半左右的比例，持續型反而有下降趨勢。整體而言有約一半的已婚婦女仍受婚育因素影響而維持以往的就業型態。

綜合而言，二十年來最主要的變化是從未工作者的比例大幅下降，「從未工作」者逐漸轉向「婚育離職後未重返勞動市場」以及「婚育離職後重返勞動市場」的勞動參與類型。換句話說，一生都沒工作的女性減少了，但不是轉為持續型，而是在婚育前工作，或是婚育後工作。顯然對 40 歲以上的婦女而言，家庭仍是主要的生活重心，而工作與否是配合家庭需求而做調整。

表 4-4 婦女勞動參與類型變遷：1980 年、1990 年、與 2000 年

勞參歷程類型	1980	1990	2000
未婚、現有工作	0.4	1.4	2.7
未婚、現無工作	0.3	0.5	1.4
已婚			
傳統型	49.2	40.0	32.6
因結婚離職，至今未工作	8.4	14.1	18.5
因生育離職，至今未工作	2.3	4.1	6.2
婚前至今一直未工作	38.5	21.8	7.9
中斷型	2.7	8.2	19.7
因婚姻中斷，現有工作	1.1	4.8	9.2
因生育中斷，現有工作	0.9	2.2	8.3
其他原因中斷，現有工作	0.7	1.2	2.2
傳統型 + 中斷型	51.9	48.2	52.3
持續型	42.3	44.1	34.9
婚前至今一直有工作	30.8	34.8	29.5
婚前無，婚後至今一直有工作	11.5	9.3	5.4
其他	5.1	5.8	8.7
曾因結婚離職，且曾恢復工作，現未工作	0.3	0.8	1.9
曾因生育離職，且曾恢復工作，現未工作	0.6	0.7	1.4
曾因其他原因離職，至今未工作	4.2	4.3	5.4
已婚人口小計	99.3	98.1	95.9
女性人口總計	(N=3620)100	(N=3850)100	(N=5418)100

資料來源：1980、1990、2000 年「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原始資料。

說明：數值單位為百分比數，經加權計算。

第三節 婦女勞動參與歷程的變遷

為了進一步呈現婦女進出勞動市場的時機與步調，我們選擇曾結婚且子女數目大於零者，針對各勞動參與類型分別計算三個年期受訪者受教年數、初婚年齡、初婚至復職期間（曾中斷離職者）之平均數，來組合不同世代婦女一生的勞動參與歷程；不過由於樣本限定於 40-49 歲受訪者，故僅能約略描繪出受訪者 49 歲前的勞動參與歷程。

各種勞動參與類型的歷程均從受訪者就學時間開始計算，首先根據受訪者

的教育程度換算成教育年限，再加六（假設六歲入學），視為其畢業年齡。其次將問卷中受訪者初婚年齡及生育第一胎的年齡分別作為「因結婚離職者」與「因生育離職者」離職時機的標的年齡，若因婚育離職後有再復職者，則依據問卷中「因結婚/生育離職後多久復職」問項計算離職至復職年數。如因結婚中斷就業後再復職者，我們將其初婚年齡視為其離職的時機，再根據其「因結婚離職多久後復職」計算其離職至復職的時間。因生育中斷就業後再復職者的勞參歷程計算方式與前者類同，不過因離職胎次不一，在大部分樣本是於第一胎離職的情況下¹，在此視第一胎生育時間為離職的時機，再根據其「因生育離職多久後復職」計算其離職至復職的時間。

一、傳統型勞動參與歷程

從圖 4-5 與圖 4-6 為傳統型就業型態者勞參歷程步調的變化²可看出因為教育水準的提高使得晚近世代婦女參與勞動市場的時機延後，但「因結婚離職後未復職」者的初婚以及生育的年齡並未明顯隨之延後，三個世代的婦女均約略在 23 歲退出勞動市場，之後未再進入。「因生育離職後未復職」者，年中及年輕世代的初婚以及生育年齡有較明顯的延後，年長與年輕世代生育第一胎的年齡分別為 24.0 及 25.8 歲，受到生育年齡延後的影響，使得「因生育離職後未復職」者退出勞動市場的年齡延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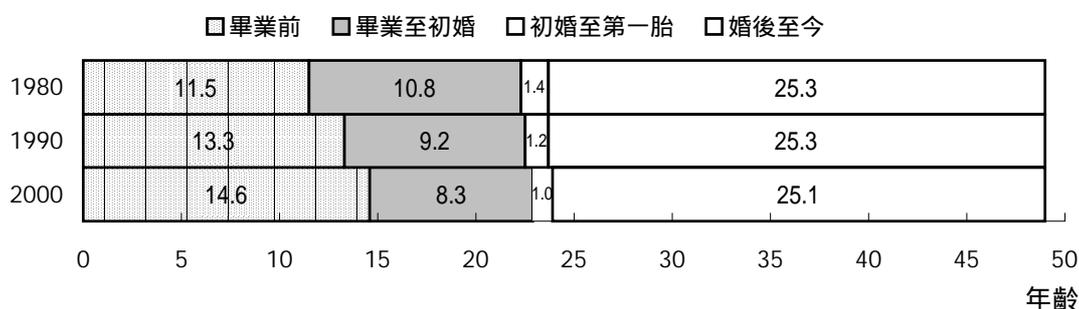
二、中斷型勞動參與歷程

在中斷型勞動參與歷程的比較方面，「因結婚中斷後復職」者（圖 4-7），三個世代的初婚年齡仍然沒有明顯差異，約略在 22 歲退出勞動市場。復職年齡以

¹ 1990 年資料與 2000 年資料曾因生育離職者曾經於生育第一胎時離職的比例分別為 79.6% 與 80.2%，1980 年資料則無受訪者離職胎次資料，僅能得知其生育第一胎之時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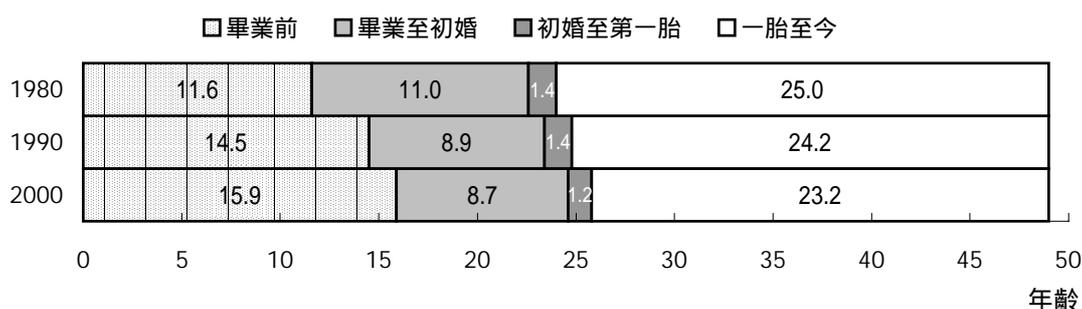
² 圖 4-5 至 4-12 灰階部分代表參與勞動市場，白色部分代表未參與，數值以年為單位。從未就業者無勞動參與歷程可言；其他原因中斷就業者，因無法得知其離職/復職時間，故無法列出其勞動參與歷程。各歷程樣本數如附錄。

圖 4-5 「因結婚離職後未復職」者勞動參與歷程之變遷



資料來源：1980、1990、2000 年「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原始資料，經加權計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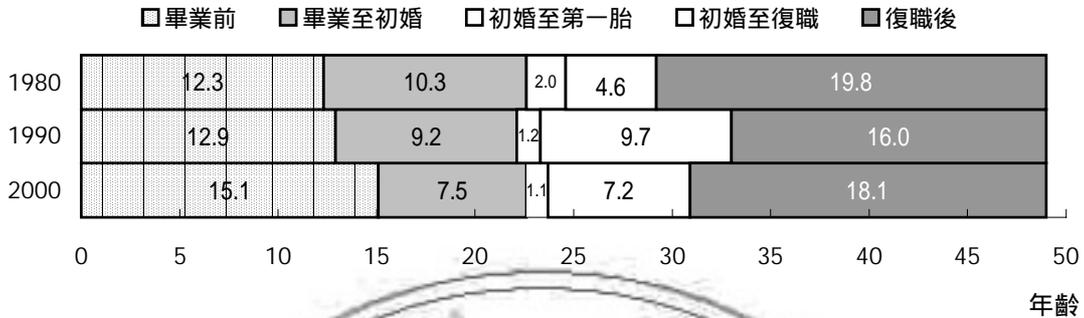
圖 4-6 「因生育離職後未復職」者勞動參與歷程之變遷



資料來源：同圖 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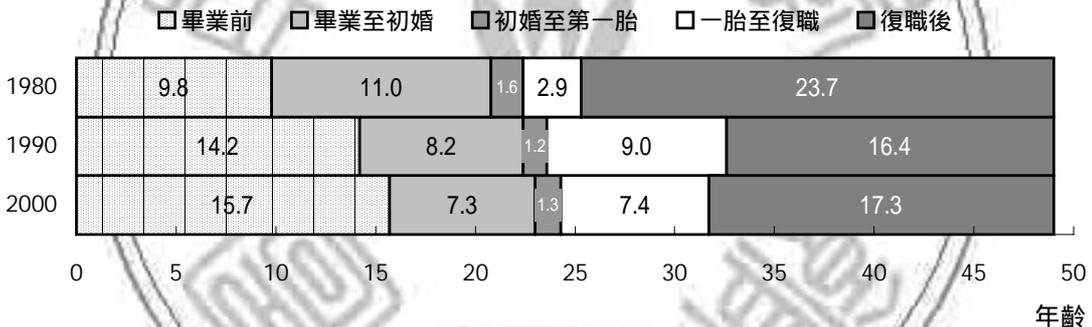
年長世代最早 (29.2 歲)，其次為年輕世代 (30.9 歲)，年中世代則平均至 33 歲才返回勞動市場。「因生育離職後復職」者勞動參與步調的變遷情形也有類似的發展 (圖 4-6)，年長世代因生育退出勞動市場的時機較年中與年輕世代來得早 (分別為 22.4、23.6、24.3 歲)，復職時間方面，也是年長世代最早 (25.3 歲)，其次為年輕世代 (31.7 歲)，年中世代因生育離職後最晚重返勞動市場 (32.6 歲)，不過年長世代的樣本數過少，兩類中斷型勞動參與歷程樣本數分別為 29 與 32 人 (參考本文附錄)，因此年長世代者中斷型勞動參與歷程的實際情形有待斟酌。不過可以確定的是，年輕世代較年中世代晚進入勞動市場，而較早返回勞動市場，因婚育中斷就業的期間確實隨世代的變遷而縮短了。

圖 4-7 「因結婚離職後復職」者勞動參與歷程之變遷



資料來源：同圖 4-5。

圖 4-8 「因生育離職後復職」者勞動參與歷程之變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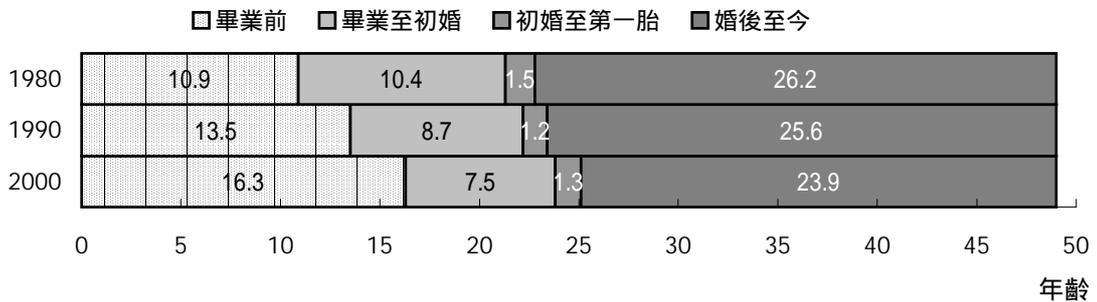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同圖 4-5。

三、持續型勞動參與歷程

圖 4-9 與圖 4-10 為持續型就業者的勞動參與歷程變遷情形，與其他勞參類型相同，由於平均教育年數的提升而延後進入勞動市場，而「婚前無工作，婚後持續工作」者的圖型顯示年中世代與年輕世代較年長世代提早進入勞動市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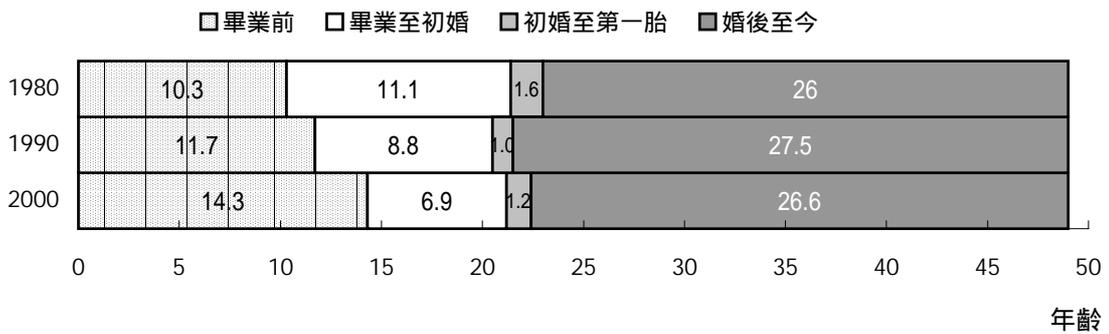
圖 4-11 與圖 4-12 為其他型就業者的勞動參與歷程之描繪，此類勞動參與歷程，由於年長世代與年中世代的樣本數甚少，故在此僅列出勞參歷程圖供參考，不做比較。

圖 4-9 「婚前持續工作」者勞動參與歷程之變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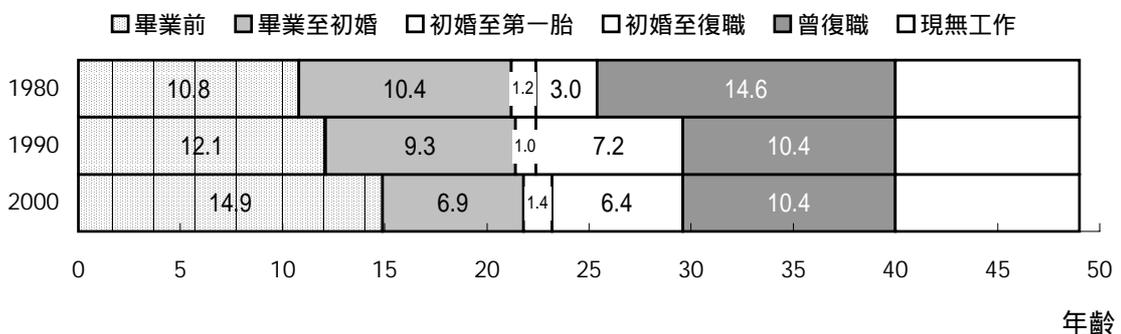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同圖 4-5。

圖 4-10 「婚前無工作，婚後持續工作」者勞動參與歷程之變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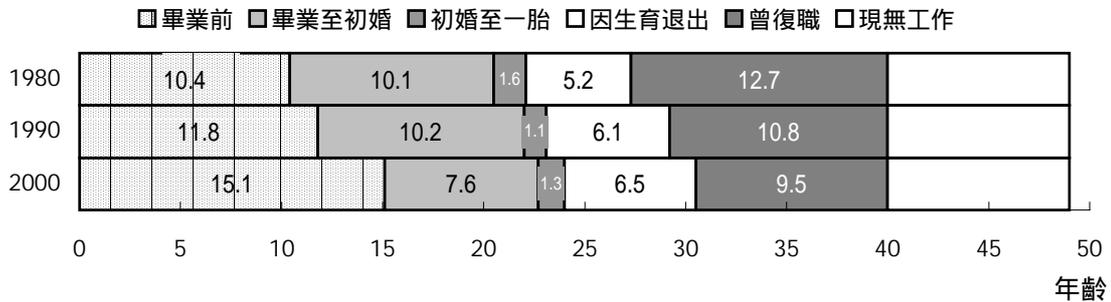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同圖 4-5。

圖 4-11 「結婚離職後曾復職，再離職」者勞動參與歷程之變遷



資料來源：同圖 4-5。

圖 4-12 「生育離職後曾復職，再離職」者勞動參與歷程之變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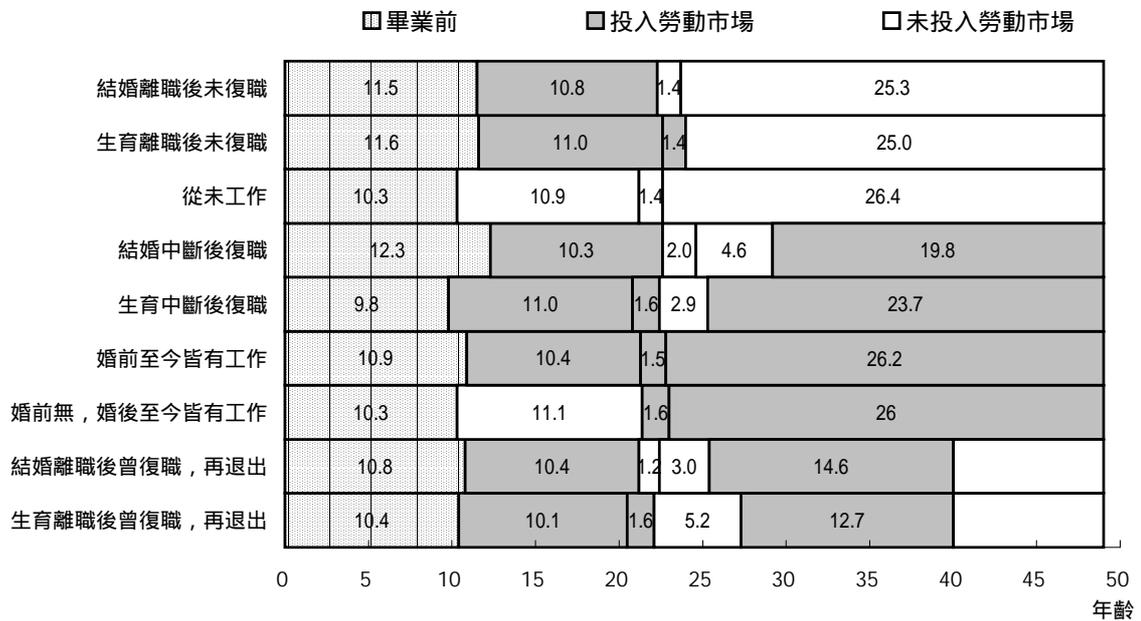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同圖 4-5。

四、各類型勞動參與歷程的比較

為了比較不同勞參類型間生活歷程以及勞動參與歷程的相異點，我們將各類型並列繪如圖 4-13 至 4-15，並將「從未工作」者也納入比較。首先比較傳統型與中斷型的差異，此兩者的差別在於離職後是否會再返回勞動市場。就「因婚/育離職後未復職」與「因婚/育離職後復職」者的圖形看來，兩者的教育年限相當，而未復職者平均而言較重返者延後退出勞動市場³，此情形在越年輕世代越明顯，是否代表著越晚婚/育者越不易重返勞動市場，還是該類婦女原本就有婚育後退出勞動市場的打算，因此在婚育前盡量累積經濟資本，有待進一步探討。在重返勞動市場者中斷期間的比較上，年長世代與年中世代的圖形顯示「因結婚中斷後復職」較「因生育中斷後復職」者有較長的中斷期間（分別為 4.6 年與 2.9 年，9.7 年與 9.0 年），可能是後者延至生育生育時才離開勞動市場，累積的人力資本較高，有利於其儘早再重返勞動市場，或者是後者原本就較前者有較高的經濟需求，因此延後進入勞動市場而又較早返回。但到了年輕世代，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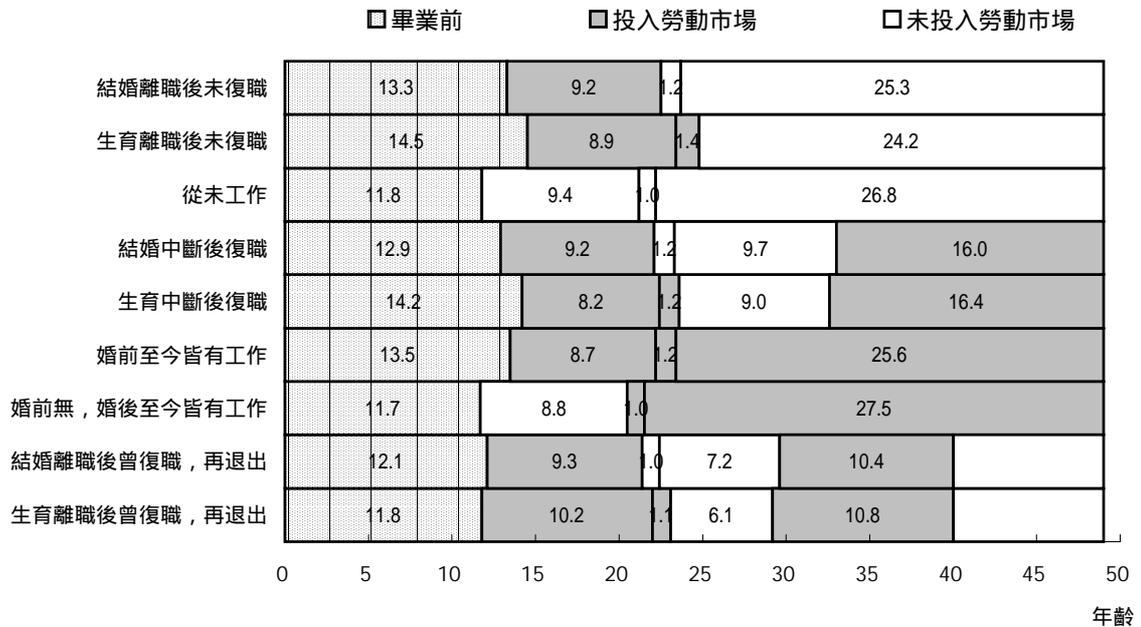
³ 若將結婚與生育第一胎年齡視為離職時機，1990 年資料與 2000 年資料分別顯示結婚離職後未復職者於 22.5 歲，22.9 歲離職，結婚離職後復職者於 22.1 歲，22.6 歲離職。離職後未復職者於 24.8 歲，25.8 歲離職，生育離職後復職者於 23.6 歲，24.3 歲離職。1980 年資料因中斷型就業者樣本數不足，不納入參考。

圖 4-13 各類型勞動參與歷程比較 (198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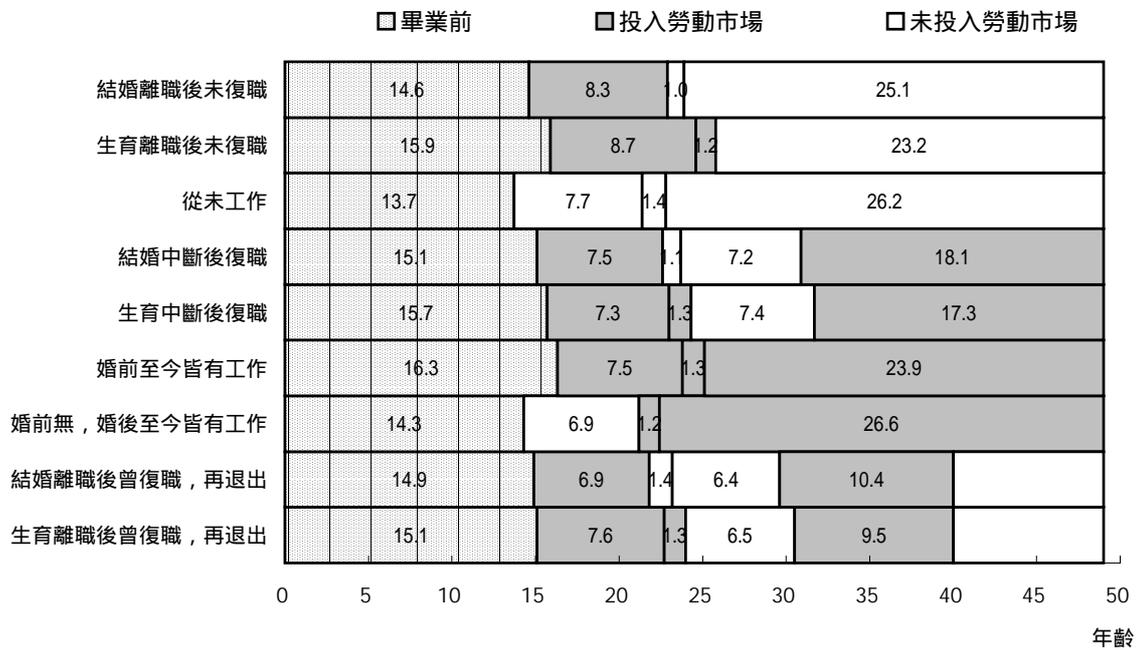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如圖 4-5。

圖 4-14 各類型勞動參與歷程比較 (1990 年)



資料來源：如圖 4-5。

圖 4-15 各類型勞動參與歷程比較 (2000 年)



資料來源：如圖 4-5。

生育中斷者並沒有較早返回勞動市場，但與年中世代比較，返回的年齡明顯提早，可見婚育對婦女就業生涯的影響逐漸減少。

持續型就業一般認為因為其人力資本較高，故得以持續就業，從三個世代的圖形來看，年長世代資料的教育年數並未顯得特別突出，但是年輕世代「婚前至持續工作」者的教育年數就居首位了，然而人力資本並非勞動參與型態決定的唯一因素，各對於持續就業者的工作、家庭脈絡還有待進一步探討。至於「婚前無工作，婚後持續工作」者，其平均教育年數在三個世代資料中皆屬於較低者，可能因為家庭經濟壓力致使其於婚後持續就業。此外，該類型就業者的婚育時機在年長世代資料中沒有與其他類型者有明顯差異，但是在年中與年輕世代的圖形中可看出其婚育年齡是最早的；在婚前沒有工作經驗的情形下，婚育後仍得以持續就業，或與其工作性質、家庭脈絡有關。相對的，從未就業者的教育年數在三個世代均顯示是較偏低的，除了人力資本較低外，此類業者還有哪些特質使得她們從未就業，有待進一步探討。

第四節 小結

本章主要討論台灣婦女勞動參與類型與歷程的變遷，首先我們使用 1965 年以來的婦女勞動參與率資料，轉換時期率為世代率，用以呈現整體婦女勞參歷程的變遷以及時期率可能產生的錯覺。其次利用 1980、1990 與 2000 年的「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資料，呈現婦女勞動參與類型與歷程的變遷。

當以世代年齡別婦女勞動參與率呈現婦女勞參歷程時，圖形顯示 M 字形的勞參歷程是各世代的共同特徵，表示中斷的就業型態仍是大多數女性的共同經驗。然而，在教育擴張、婚育年齡延後的影響下，晚近世代婦女退出勞動市場的時機有延後的趨勢，退出的幅度也較年長世代來得小，似乎顯示有越來越多的婦女不必以退出勞動市場來因應家庭需求。不過因為是以總體資料來描述，能獲得的資料相當有限，因此我們進一步以個體資料來描述。

1980、1990、2000 年 40-49 歲年齡組樣本的回溯資料顯示，傳統型與中斷型的勞動參與型態合計佔了一半左右的比例；雖然女性平均教育水平提升，生育子女數減少，工作時間與機會增加，但持續型勞動參與型態並沒有增加，顯示婦女勞動參與型態沒有太大改變，傳統型與中斷型的勞動參與型態仍是主流。20 年來最主要的變化是從未工作者的比例大幅下降，對 40 歲以上的婦女來說，顯然家庭仍是她們生活的重心。就業在組織家庭之前是必要的，一旦成家之後，工作即可以或者必須犧牲，至少是短暫的犧牲。

在勞動參與歷程的變化方面，就傳統型勞動參與歷程來看，婚育年齡的後延使得婦女退出勞動市場的年齡逐漸延後；就中斷型而言，再投入的年齡有逐漸提前的趨勢，加上婚育年齡的延後，縮短了婦女中斷就業的期間。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文探討台灣婦女勞動參與類型與歷程的變遷。光復後有越來越多的女性投入勞動市場，此現象可說是人口、社會與經濟環境變遷下的結果。無論就婦女勞參率的變化或婦女勞動參與類型與歷程來看，都顯示出婦女勞動參與的多样性與動態性。早期有關婦女勞動參與的研究多著重於婦女勞動參與數量上增加的原因，晚近則多從變遷或動態性的角度探討婦女進出勞動市場的過程及就業型態（蔡青龍，1988；劉鶯釧，1994；薛承泰，2000；伊慶春與簡文吟，2001）。然而，由於資料的限制，在國內缺乏婦女勞動參與之貫時性資料的情形下，也僅能從橫斷面或回溯性資料中建構出婦女的勞動參與歷程。本文延續以往的研究，嘗試透過三個年期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的回溯資料來呈現婦女勞動參與類型與歷程的變化。

我們首先回顧過去有關婦女勞動參與的討論，概略整理出幾個常見的解釋觀點。新古典經濟學與新家庭經濟學強調婦女的勞動供給的多寡是在個人/家庭效益最大化前提下抉擇的結果。人力資本論者沒有直接對婦女勞參行為提出解釋，但個人人力資本的累積為婦女進出勞參市場機會成本的考量此一衍生解釋提供了著力點。家庭生命週期觀點加入了時間向度與婦女所處情境脈絡的考量，強調生命歷程中發生的生命事件對婦女勞參的影響與意義。性別角色態度觀點則從社會大眾與個人價值觀念的轉變、性別刻板印象的逐漸式微說明婦女勞參意願與行為的提升。總體經濟發展則從需求面討論婦女勞動參與，隨著工商業的發展，相對的也增加了婦女更多的就業機會。

台灣在短短的五十多年經歷了快速的社會變遷，其中教育的普及與擴張、生育率的下降、產業結構的轉型皆有利婦女投入勞動市場。我們使用 1971-2001 年間的時間數列資料，以邏輯迴歸方程式，分年齡組說明婦女勞動參與率變遷的影響因素。討論的自變項包括代表人力投資的在學率、代表人力資本的平均

教育年數、代表家庭照顧負擔的有偶率、代表社會性別角色印象的兩性相對工資、以及代表經濟成長的實質人均所得。研究結果指出在學率的提高降低青年婦女的勞動參與率，平均教育年數在青、壯年時期有正向效果，有偶率對中高年齡的勞動參與率有負向作用，實質人均所得成長擴大了對婦女勞參的需求以及婦女就業機會。唯相對工資在大部分的年齡組未產生顯著的影響效果，可能是相對工資的變化與教育程度的變化與時並進，其只能反映兩性相對人力資本的變化，無法反映「男主外、女主內」性別刻板印象之變化。

婦女勞動在量上的增加已是事實，然而其勞參類型與歷程的變遷情形為何，值得進一步探討。我們將 1965 年至 2001 年時期年齡別婦女勞參率轉換為世代年齡別婦女勞參率，企圖透過此類似貫時性的資料描繪出不同出生世代婦女的勞動參與歷程，結果顯示晚近世代婦女退出勞動市場的時機似有延後的趨勢，正好對應了晚婚與生育率下跌的趨勢；退出後再就業的時機也提前了，因此造成典型 M 字型就業歷程中間下凹部分的跌幅降低，而蔓延的時間拉長。

惟總體資料將個體間的差異消除，且僅止於中斷型勞動參與類型的討論，無法從中看出其他型態就業歷程的變遷情形。因此我們取得 1980、1990 與 2000 年「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個體資料做進一步分析，首先比較不同世代婦女勞動參與類型的變遷，結果顯示顯示傳統型與中斷型兩者合計佔了一半左右的比例，持續型的比例並未隨著女性平均教育水平提升、生育子女數減少、工作時間與機會的增加而上升，反而有下降趨勢。二十年來最主要的變化是從未工作者的比例大幅下降，對四十歲以上的婦女來說，顯然家庭仍是她們生活的重心。就業在組織家庭之前是必要的，一旦成家之後，工作即可以或者必須犧牲，至少是短暫的犧牲。最後，我們針對不同就業歷程者，回溯計算其結婚、生育第一胎與進出勞動市場的時間，進而概略描繪出不同世代婦女勞參歷程的變遷情形。總括而言，已婚婦女的就業類型並沒有太大變化，主要的變化在於晚近世代延遲離開勞動市場而較早重返勞動市場，因婚育中斷就業的期間縮短了，無論就總體資料或個體資料來看都是如此。

第二節 討論與建議

從本文的研究結果來看，婦女勞動參與類型與歷程並未隨社會變遷而有明顯變化，持續型就業者的比例未增加，因婚育中斷就業者的比例則有些微上升趨勢。過去的研究已指出婦女中斷就業對其人力資本累積與薪資所得將造成負面影響。因此如何降低婦女中斷就業，或降低中斷就業帶來的負面影響，經常是政策制訂者關心的焦點。如前所述，婦女是否參與勞動涉及供給面與需求面的問題，而家庭照顧負擔是婦女就業的最大阻力；部分研究已提出相關建議來減低或克服家庭對女性的限制，例如對於婚育前就已在勞動市場工作的女性，可以透過育嬰或托兒機構的設置，減輕子女照顧對婦女工作的阻力；設立就業輔導機構，作為供需雙方的橋樑，提供因故不得不暫時退出勞動市場而有意願與需要再就業者，儘早再就業的機會，以縮短其中斷就業期間等等。但最終是否能減少女性因婚育中斷就業的情形，仍有待觀察。

換個角度來看，婦女中斷就業是否完全只有壞處而沒有好處？中斷就業或退出勞動市場，或彈性就業對於婚姻與家庭的穩定說不定有正向作用。國外的研究指出妻子參與勞動市場將增加婚姻的不穩定性(South, 2001; Schoen et al., 2002)，如果妻子中斷就業或退出勞動市場對夫妻雙方而言的利得最大，或許是另一種理性的選擇。

本文嘗試利用婦女勞參率的變遷以及不同類型勞參者的勞參歷程回溯資料描繪出不同出生世代婦女的勞參歷程。但在研究方法上仍有許多值得改善之處，例如在樣本的選擇上，為儘量包含完整的家庭生命週期與勞動參與歷程，本文將樣本限定於 40-49 歲的已婚女性，不能代表所有已婚婦女，對於母體情形的推論很有限。其次，有關勞動參與歷程部分，因為「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問卷並未詢問受訪者確切離職時間，故在婦女離開勞動市場時機的認定上，本文對「曾因結婚離職者」與「曾因生育離職者」分別以初婚年齡以及生育第一胎年齡作為其離職年齡。使用平均數計算受訪者初婚年齡、生育年齡與復職年齡，以估計其離職、復職時間，這樣的計算方法僅能概略瞭解不同勞動參與類

型者一生就業歷程的差異與變遷情形，且對於婦女進出勞動市場確切時間點的掌握難免產生誤差。未來相關研究若欲對於動態歷程有所掌握，可參考使用事件史 (event history) 的分析方法，或使用生命表方式來模擬各類勞動參與週期，勢必將更精確也更有說服力。

附錄 各類型勞動參與歷程樣本數

單位：人

勞動參與歷程	1980	1990	2000
傳統型			
因結婚離職後未復職	284	532	907
因生育離職後未復職	77	157	313
從未就業	1397	819	456
中斷型			
結婚中斷後復職	29	184	509
生育中斷後復職	32	83	420
持續型			
婚前至今皆有工作	1090	1311	1580
婚前無工作，婚後至今皆有	420	355	318
其他型			
結婚離職後曾復職，再退出	11	30	94
生育離職後曾復職，再退出	24	27	85
總計	3364	3498	4682

資料來源：1980、1990、2000年「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原始資料，經加權計算。

說明：本表樣本限定於已婚且子女數目大於零者（詳見第四章第三節），表 4-4 則單純為各類勞動參與類型的分佈情形，故兩者間樣本數相異。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份

- 王文娟、李華夏、吳惠林、鄒繼礎 譯 (1997), Becker, G. S. 著, 《家庭論》。台北：立緒文化。
- 伊慶春與高淑貴 (1986), 「有關已婚婦女就業的性別角色態度」。中研院三民主義研究所專題選刊 70。
- 伊慶春與簡文吟 (2001), 「已婚婦女的持續就業：家庭制度與勞動市場的妥協」。《台灣社會學》1：149-182。
- 吳慧瑛 (1996), 「家庭勞動供給的跨期分析」, 收錄於陳肇男、劉克智、孫得雄、江豐富主編《人口、就業與福利》, 頁 73-105。台北：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 李誠 (1975), 「台灣勞動供給之初步分析」, 收錄於李誠 編《台灣人力資源論文集》, 頁 119-145。台北：聯經出版社。
- 呂玉瑕 (1997), 「助力與阻力之間：家庭互動關係與已婚婦女就業」, 收錄於張荳雲、呂玉瑕、王甫昌主編《九一年代的臺灣社會》, 頁 1-39。台北：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
- 孫智嫻與李朝賢 (1992), 「農家婦女勞動使用研究---生命週期理論之應用」, 收錄於《人口轉型中的家庭與家戶變遷研討會論文集》, 頁 9-33。台北：中國人口學會。
- 張清溪 (1980), 「結婚生育與子女數對有偶婦女勞動供給的影響」, 《經濟論文叢刊》9(2)：167-223。
- 張昌吉 (1992), 「我國勞工薪資所得與決定因素之分析」, 《勞動學報》2：111-126。
- 張晉芬 (1996), 「女性勞動者婚育離職原因之探討」, 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小型專題研討會論文。台北：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

- 張素梅 (1988),「婦女勞動參與率的研究---聯立模型分析」,《經濟論文叢刊》16(2): 175-196。
- 陳寬政、王德睦與陳文玲 (1986),「台灣地區人口變遷的原因與結果」,《人口學刊》9: 1-25。
- 單驥與陳圳忠 (1990),「台灣地區大小家庭結構對已婚婦女勞動供給的影響」,收錄於《人口變遷與經濟社會發展研討會論文集》,頁 255-276。台北:中研院經濟學研究所。
- 曾敏傑 (2001),「台灣地區兩性薪資差異與變遷:1982、1992 及 2000 年的比較」,《人口學刊》23: 147-209。
- 曾敏傑 (2002),「人力資本、勞力區隔與性別薪資歧視:藍領與白領工作者的比較」,《台灣教育社會學研究》2(1): 113-153。
- 楊靜利 (1996),「婦女勞動參與對生育率的影響」,《台灣社會學刊》19: 35-56。
- 楊靜利與劉一龍 (2002),「台灣的家庭生活歷程」,《台灣社會學刊》27: 77-105。
- 劉鶯釧 (1994),「台灣的婦女勞動供給」,收錄於梁國樹 編《台灣經濟發展論文集》,頁 373-401。台北:時報文化。
- 蔡青龍 (1988),「婦女勞動再參與的初步分析」,《經濟論文叢刊》16(2): 149-174。
- 蔡青龍與張美陽 (1996),「勞動市場之性別差異---以台灣為例兼與亞太各國比較」,收錄於陳肇男、劉克智、孫得雄、江豐富主編《人口、就業與福利》,頁 213-254。台北: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 薛承泰 (2000),「台灣地區已婚婦女再就業時機的初步分析」,《人口學刊》21: 77-99。
- 薛承泰與簡文吟 (1997),「再就業婦女的職業流動初探」,《人口學刊》18: 67-98。

簡文吟 (1997),《台灣地區已婚婦女就業型態之分析：離職與復職的檢視》。台北：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簡文吟與薛承泰 (1996),「台灣地區已婚婦女就業型態及其影響因素」,《人口學刊》17: 113-134。

二、英文部份

- Barrow, L. (1999) "An Analysis of Women's Return to Work Decisions Following First Birth," *Economic Inquiry* 37(3): 432-451.
- Becker, G. S. (1980) *Human Capital: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duca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ielby, D. D. V. and W. T. Bielby (1984) "Work Commitment, Sex Role Attitudes and Women's Employ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9(2): 234-247.
- Blau, F. D. and A. J. Grossberg (1991) "Real Wage and Employment Uncertainty and th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Decisions of Married Women," *Economic Inquiry* 29(4): 678-695.
- Charles, L. B. (2002) "A Dynamic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Childcare Cost on the Work Decisions of Low Income Mothers with Infant," *Demography* 39(1): 139-164.
- Cheng, B. S. (1999) "Cointegration and Causality Between Fertility and Female Labor Participation in Taiwan: A Multivariate Approach," *Atlantic Economic Journal* 27(4): 422-434.
- Cramer, J. C. (1980) "Fertility and Female Employment: Problems of Causal Direc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5(1): 167-190.
- Desai, S. and L. J. Waite (1991) "Women Employment During Pregnancy and After the First Birth: Occup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Work Commit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6(4): 551-566.
- Dooley, M. D. (1994) "The Converging Market Work Pattern of Married Mothers and Lone Mothers in Canada,"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9(2): 600-620.
- Drobnic, S., H. P. Blossfeld, and G. Rohwer (1999) "Dynamics of Women's Employment Patterns over the Family Life Course: A Comparis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y,"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61(1): 133-146.
- Felmlee, D. H. (1984) "A Dynamic Analysis of Women's Employment Exit," *Demography* 21(2): 171-183.

- Felmlee, D. H. (1995)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Women's Employment Discontinuity, 1967-1973," *Work and Occupations* 22(2): 167-187.
- Ferber, M. A. (1982) "Labor Market Participation of Young Married Women: Causes and Effect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4(2): 457-468.
- Glass, J. L. and L. Riley (1998) "Family Responsive Policies and Employee Retention Following Childbirth," *Social Forces* 76(4): 1401-1435.
- Hamermesh, D.S. and A. Rees (1993) *The Economics of Work and Pay*. NY: Haper Collins College Publishers, Inc.
- Killingsworth, M. R. (1983) *Labor Supply*.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eibowitz, A. (1974) "Education and the Allocation of Women's Time," Pp. 171-197 in *Education, Income and Human Behavior*, edited by Juster, F.T. New York: McGraw-Hill.
- Leibowitz, A. and J. A. Klerman (1995) "Explaining Changes in Married Mother's Employment over Time," *Demography* 32(3): 365-377.
- Lombard, K. V. (1999) "Women's Rising Market Opportunities and Increased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Economic Inquiry* 37(2): 195-212.
- Lu, Y. H. (1992) "Married Women's Informal Employment in Taiwan," I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ROC* 2(2): 202-217.
- Lu, Y. H. (1993) "Sex-role Attitudes and the Employment of Married Women—A Detroit Area Study," *Journal of Women and Gender Studies* 4: 137-174.
- Lu, Y. H. (1995) "Changes in Women's Work Patterns During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1980-1988," In *Families, Human Resource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Edited by th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Pp.159-195.
- McLaughlin, S. D. (1982) "Differential Patterns of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Surrounding the First Birth,"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4(2): 407-420.

- Nakamura, A. and M. Nakamura (1994) "Predicting Female Labor Supply: Effect of Children and Recent Work Experienc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9(2): 304-328.
- Pampel, F. C. and K. Tanaka (1986)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A Reconsideration," *Social Forces* 64(3): 599-618.
- Presser, H. B. (1994) "Employment Schedules among Dual Earner Spouses and the Division of Household Labor by Gende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9(3): 348-364.
- Schoen, R., N. M. Astone, K. Rothert, N. J. Standish, and Y. J. Kim (2002) "Women's Employment, Marital Happiness, and Divorce," *Social Forces* 81(2): 643-662.
- Schumann, P. L., D. A. Ahlburg, and C. B. Mahoney (1994) "The Effects of Human Capital and Job Characteristics on Pay,"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9(2): 481-503.
- Scott, J., D. F. Alwin, and M. Braun (1996) "Generational Changes in Gender-Role Attitudes: Britain in a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Sociology* 30(3): 471-492.
- Smith, J. P. and M. Ward (1985) "Time Series Growth in the Female Labor Force,"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3(1): S59-90.
- Sorensen, A. (1983) "Women's Employment Patterns After Marriag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5(2): 311-321.
- South, S. J. (2001) "Time Dependent Effects of Wives' Employment on Marital Dissolu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6(2): 226-245.
- Thornton, A., D. F. Alwin, and D. Camburn (1983)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Sex-Role Attitudes and Attitude Change," *American Sociology Review* 48(2): 211-227.
- Wait, L. J. (1980) "Working Wives and The Family Life Cycl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8(2): 272-294.
- Yi, C. C. and Chien, W. Y. (2002) "The Linkage Between Work and Family: Female's Employment Patterns in Three Chinese Societie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 33(3): 451-474.